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3月31日第8期 总第25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2期

目录

【编者按】

本期要览：文革中的农民，中央对红卫兵打死人的态度

【专稿】

石革文 文革的边缘人——农民阶层与文革

【评论】

印红标 中央将打死人列为红卫兵战果吗？

【红色文化】

烏紫拉 求爱与做爱——政治语言的泛化

【读书】

啟 之 读周密的《回望》

——周扬的女儿谈文革中的军管会

【怀人】

何與懷 他在凌晨离去，留给世界一道光亮

——纪念白桦先生

何與懷 那颗曾经划破夜幕的陨星

——纪念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遇罗克

【述往】

贺美湘 独自生存之三：一九七六！一九七六！

附：笑对生活就能走出人生逆境（记者报道）

【文摘】

刁晏斌 文革时期的语言及其研究

第三章 词汇研究（二）：词语的显现与潜隐，

第一节 词语的显现

龙应台 什么是文化（三）——文化可以立国

【书讯】

王晓林 《顾准和他的时代》

【本刊声明】

【编者按】

本期要览：文革中的农民，中央对红卫兵打死人的态度

文革发动时，全国总人口是七亿四千万，其中有六亿五千万是农民。文革结束时，全国总人口是九亿三千万，其中有八亿两千万是农民。这一群体对文革的态度，这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代表农民说话的是哪些人？这些问题在文革研究界鲜有人关注。


石革文的文章填补了空白。

作者告诉我们：农民对文革是漠然的，他们的关心的是基本生存问题。农村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认识和态度与上面并不一致，有些冲突和斗争是表面性的，甚至带有娱乐化的成分。农村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传统宗族矛盾的延续，只不过披上了文革的外衣。家庭纠纷、邻里矛盾被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无限上纲，为祸惨烈。

相对来说，农村干部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受益的群体。他们不像城市里的干部那样受到冲击，其子女可以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方式进入城市，摆脱农民的身份。贫下中农虽然被赋予貌似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其社会地位低下。农村文革的深度参与者，是那些出身于农村的青年学生。全国性的造反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等都来自农民阶层，各省造反学生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追求公平与平等的思想，并产生了改造社会，提升农民阶层地位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农民阶层不自觉的代言人。

印红标讨论的是中共中央对红卫兵打死人的态度。他认为，1966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对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出现的种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径，采取了根本错误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是有差别的：对于改名、禁止某些习俗的作法，予以公开赞赏；对于抄家、驱逐，予以鼓励和推进；而对于打人甚至打死人，则在劝阻的同时，予以阶段性的姑息、纵容和庇护，包括对打死人的红卫兵不予追究。但在政策上则不予赞许和支持。但是，几篇揭露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却认为，当时中共印发的两个材料将红卫兵打死人列入“辉煌战果”。作者认为，这种说法是误判或过度解读。

周密，周扬的女儿在回忆录中不但讲述了其父其母在文革中的遭遇，而且讲到了工军宣队在文革中的恶劣行径。这些回忆弥足珍贵。

何與懷撰写了十多篇纪念性散文，这里选用两篇：1月15日凌晨，白桦先生在上海逝世。作者分析了白桦的长诗《从秋谨到林昭》和《八十年一梦》。遇罗克是1970年3月5日遇害的，作者把他比做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专稿】

文革的边缘人

——农民阶层与文革

石革文

文革是充满种种悖论的历史事件，给人们设置了诸多历史困境和道德困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再没有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复杂和矛盾的历史时期了，文化大革命堪称史无前例，也再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会使得一切历史的类比都陷于无效。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在现代历史上，也很少有这样的历史片断，它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¹要揭示文革的起源和本质，理解文革的进程和结果，需从多学科的视角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透视与解剖，现在的文革研究多局限于历史学、政治学等视角的记述与探讨，亟需将研究视角拓展到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探求文革真相，必须了解文革发生的社会环境和人群的分层状况以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了解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运行机制，即中国社会是如何控制、整合、调控、统治或分化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或体制、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机制，构造了社会的制度结构？运用社会分层理论，从国家与社会、民众互动的视角分析文革现象，研究文革可能更能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本质的认识。

一 文革前后的社会分层状况

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社会资源是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和利益的物品、非物品以及事件的总称，它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等。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或者获取，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人们的社会态度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地位的产物。因此，社

¹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39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会成员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以及社会态度。决定社会各阶层处于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即社会地位高低的因素在于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支配及享受收益的程度。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区分各个社会阶层的首要差异,在于各个阶层占有的资本总量不同。资本总量即为人们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与权力,即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构成。经济资本主要是指财产、收入等经济资源。文革前的中国社会虽然在形式上消灭了财产私有制,对经济资本的个人占有在形式上基本不存在,但对经济资本的实际占有、支配、收益在社会阶层中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有实际占有、支配权的社会阶层还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高位置。布迪厄社会分层思想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文化、生活方式、品味、惯习等在区分社会地位差异方面的重大作用。符号资本,也译作象征资本,指运用符号使占有不同形态的其它三种资本合法化。社会上的不同阶级、不同群体占有的资本总量是不一样的,所以,四种资本的总量和类型决定了阶级地位和阶级结构。支配阶级、中间阶级、下层阶级。¹

每个社会都分为地位高低不等的结构或社会地位差异的网络,即地位差异结构。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分配规则及社会流动等因素决定的。文革前后的社会是典型的人造秩序,决定文革时期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的关键因素与其他社会相比,有明显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它取决于当时的四种重要的制度设计,即户籍制度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单位体制与群体等级制度、统购统销与再分配制度、阶级路线与身份制。依据对中国社会结构以及影响社会分层重要制度的分析,当时的社会人群分为干部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贱民阶层。干部阶层是唯一具有整体组织的社会结构因子,这一群体构成一个严密的自上而下的,对外独立,内部结构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其他社会成员也有组织,但不够独立,也没有形成整体性系统。每个社会阶层根据不同的状况又可分为不同的群体。这些阶层、群体对文革的态度以及在文革中的不同利益诉求、行动综合发生作用,从而决定了文革的方式、进程、走向和结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文革是由干部阶层(精英阶层)因对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现状主张采用不同的方式而引起的,由执政党最高领导者发动和主导,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共同参与,并借用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追求并力图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社会运动。

文革主要是在城市的运动,虽然农民阶层是文革中的非主流群体,但由于人数在中国社会中占绝对优势,对文革的态度及行为对文革进程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¹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第280—28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二 农民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征

农民阶层是指所有城镇人口之外的人。什么是城镇人口，国家分别在 1955 年、1963 年、1984 年提出过三个标准。城镇包括：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以及未设建制的城镇居民点（县城、工矿区、农垦场场部等），这些地方的人口是城镇人口。1966 年，全国总人口 74542 万人，城镇人口 9965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37%；1976 年，全国总人口 93717 万人，城镇人口 1134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10%。¹户籍制度将人们分为两类：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所有持农村户口的人均被称为农民，属于农民阶层。这部分人占总人口的 80% 以上。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中的工人和非农业人员。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就业等方面远远低于持城市户口的人。从城乡消费水平比较看，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的 2.4—3.2 倍。国家通过在全国普遍实行的按户籍定量用票证供应生活资料的制度以及计划性极强的劳动人事制度和档案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业人口的比重保持惊人的稳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1952 年为 87.5%，1978 年为 82.1%，年平均下降仅为 0.25%，同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反而由 30.1% 上升为 31.4%。²

国家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政策，从农村汲取资源补贴城市。据统计，1978 年前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为 4881 亿元，而在 1952 年至 1978 年中国工业投资累计才只有 3679.6 亿元。农业提供的资金甚至大于同期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额。³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战士提拔为干部、少数农村非脱产干部转为脱产干部，以及国家因特殊建设工程需要招收少量职工以外，原则上不能转成非农业户口，从而也就没有权力进城就业。这种身份还具有世袭性和继承性。

农民阶层根据其实际生活状况和身份界定，可以分为农村干部群体和其他农民构成的纯农民群体两大类。农村干部群体不属于干部阶层，但由于其有一定的资源控制和社会管理职能而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看作是国家和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主要是生产大队、生产队中具有管理职能的一部分人。农村干部群体和普通农民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有天壤之别。

¹ 朱汉国、耿向东等著：《20 世纪的中国一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 1949—2000）》第 69 页，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中国人口》，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7 页；

² 孔令栋：《权威与依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载《文史哲》2001 年第 6 期。

³ 王育琨著：《中国：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第 15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三 农民阶层的文革

文革历时十年之久，其影响遍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但从其影响程度来看，对城市的影响远远大于农村。有的学者认为：1963年到1966年开展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可以看作是文革的前奏。1965年初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与文革的目标有共同之处。有些学者认为，“1962-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若干方面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¹四清运动的斗争与批判对象主要是属于农民阶层的农村基层干部，由于城乡的隔离和二元社会结构的现实，农村基层干部并不属于干部阶层，因而四清运动中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打击、伤害并没有引起干部阶层的任何警惕，而干部阶层在文革之初的遭遇几乎与农村干部在四清中的遭遇相同。

文革前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和乡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文革使城市青年开始了解农村，真正体验农民的苦难和不幸，并进而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思考，对文革产生了新的思考。

中国农村难以想象的贫穷是下乡城市青年的第一印象。徐冰在《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一文中描写了他所插队的北京郊区收粮沟村的状况：这地方要我看，有点像母系社会，家庭以妇女主轴，一家需要两个男人来维持，不是为别的，就是因为穷的关系。再偏僻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有些家庭是：一个女人除了一个丈夫外，还有另一个男人。女人管着两个男劳力的工本，这是公开的。如果哪位好心人要给光棍介绍对象，女主人就会在村里骂上一天：“哪个没良心的，我死了还有我女儿呐……”好心人被骂的实在冤枉，就会出来对骂一阵。²农民阶层地位之低劣从其选择上也能看出，在1978年大批城市知青因生活困苦而要求返城，而返城之后国营农场的劳动职位由从山东、河北、河南穷山僻壤自发过来的农民顶了知青的位子。³

贫下中农虽然被赋予貌似崇高的政治地位，位列红五类之列，其实农民的实际社会地位之低下，则是全社会的共识和社会的现实。阎连科，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文革期间曾有知青到其村里插队。他在阎连科《我的那年代》写道：“说句实在话，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坛轰然兴起的知青文

¹ 【美】詹姆斯·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第19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² 徐冰：《愚昧作为一种养料》，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17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³ 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伟大的受难者们》第1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学，把下乡视为下狱。把一切苦难，多都直接、简单地归为某块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一些愚昧。这就让我常想，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说心里话，和农民永远无法理解城市、无法理解知青下乡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一样，知青们和曾经是知青的作家们、诗人们、教授们，其实也都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曾经在那土地上生活了几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那土地上活过来的千百年的人们。”¹当时一个男农民强奸一个女知青未遂而被判死刑。而一个男知青强奸一个十六七岁的村里女孩并导致其投河自杀，结果只是政府的干部陪着男的父母，从城里来到乡下，作赔了一些钱物了事。“直到今天，对于知青我都没有如许多的人们说的那样，感到是因为他们，把文明带进了乡村。是因为他们在乡村的出现，才使农村感受到了城市的文明和文化。于我最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城乡的不平等差距，因为他们的出现，证明了远远大于原有人以为的存在，远远不只是一般的乡村对都市的向往与羡慕，还有他们来自娘胎里的对农民和乡村的一种鄙视。”²

文革在农村并不像城市那样轰轰烈烈，中央高层对农村文革曾也有部署安排，但文革的阶段特征在农村并不明显。由于刚刚进行了四清运动，原来的许多农村干部被打倒，农村的文革开始的也较晚。文革初期，一些城市的近郊农民被干部动员进入城市参与城市文革，被中央及时发现并明确制止。1966年12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对农村文革作出了明确规定：农村文革按照《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一般不派工作队；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农村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选举产生；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社、队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对向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是专政的对象，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

在许多农村，文革期间并不像城里那样对所谓黑五类和受批判者给予歧视和羞辱。

¹ 阎连科：《我的那年代》，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397—398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² 同上，第400页。

夏青是40年代在东北红极一时、最有影响的青年演员，毅然加入中共领导的哈尔滨剧院，成为党在东北文艺战线的骨干。建国后随其夫到北京工作，在中国评剧院二团担任主演。1956年因其丈夫被中国作家协会划为反党分子而要求限期离京，夏青随丈夫下放到辽宁省本溪市。其丈夫被安排在当地一家工厂，夏青被安置在本溪评剧团。1966年文革爆发，他们是第一个被造反派抓出来接受批判的。每天由各种各样的组织轮番批斗，一天下来十几个钟头。家里也被查抄，窗口被大字报盖得不见光线，孩子中断学业，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随后全家先后被下放到辽宁省桓仁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夏青的工作是给生产小队拾捡散落在街道和各家厕所的人畜粪便。她学会了养猪，学会了做饭，学会了一个农村妇女所应会的一切。据夏青之子李霄明在《记我的母亲夏青》一文说：当时，我们家所在的小队的队长和老乡们也给予了我们极大地爱护和帮助，是他们的淳朴、善良使父母暂时淡忘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在那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农村也不例外。但农民却不太在乎，他们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和像我们家这种突然地到来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热情就说明了一切。队里上至老人下至孩子们对我们一家，特别是对母亲这样一位他们眼里的知名演员，能下放到这里与他们同住同吃同劳动，都感到特别高兴。人们常常说这是他们的缘分，对上级告诫他们不要与我们往来的禁令不予理睬。反而给予父母和我们家人更多的方便和照顾。当时这对我们家庭来讲，是多么宝贵的馈赠。¹

农村与城市的运动完全不同，文革使已经受到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大饥荒影响的党的组织和干部的权威和威信再度下降，并使农民产生了更多困惑，许多农民对文革的态度是漠然的，有种置身度外的感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人民也对群众运动及无休止的意识形态教育带来的一再重复的负担表现出越来越不以为然了。现在毛及其思想的极端化是对人们信仰的嘲弄，使用恐怖手段对付令人尊敬的老干部，使大多数人感到震惊和厌恶。……大部分的城市人口都以不同方式卷入其中。而住在中国农村的六亿人，相对来说没有怎么受到革命行动的影响，因为这一运动主要是在城市。但是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毛对他长期信任的领导人发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对于领导层的智慧和效率的信心一定会受损。”²

农民对于自身在中国所处的社会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运动的结局似乎早在他们的

¹ 李霄明：《记我的母亲夏青》，载者永平主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册第60—65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² 《中情局关于中国文革的国家情报评估（1967年5月25日）》，载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伍，第八编第97页，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意料之中，农民阶层的文革有其自身的逻辑，喊得震天响的文革话语在农民那里具有与官方宣传完全不同的含义，与主流文革话语体系风马牛不相及。文革期间，一个政治运动连着一个政治运动，最高层的文革部署貌似传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农民对运动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关注点还是在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上，农村对所谓阶级敌人的认识和态度与上面的要求并不一致，有些冲突和斗争则是表面性的，甚至带有娱乐化的成分。叶维丽、马笑冬在回忆插队时农民状况时说：“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有两个双职工，那就跟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呢？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能打成反动言论，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言论自由。”叶维丽认为：有意思的是，老乡好像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有时当着我们的面，他们就议论女知青怎么就不像女人，形体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乡们在地里干活时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情……他们从来不避我。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一年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没问题的很多都当兵去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邦邦，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¹

唐晓峰，1948年生，文革时是北京四中学生，辽宁海城人。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1975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他在《难忘的1971》写道“在农村读书，没那么紧张，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到了农村，其实是处于城乡两不管的状况。城市的紧

¹ 叶维丽、马笑冬：《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177、190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张在农村不存在，城里的出身问题，在农村对不上号，也没有人认真追究。在老乡看来，城里人同属于一个阶级。从县里到村里，没有人认为知青真的是新农民。在城乡制度均管不着的情形下，知青是暂时轻松自在的。只要不把插队看作扎根，不把苦累当作苦命，知青的日子并不难过，甚至还有苦中乐。”¹“农村里头，无人没有阶级标签，比城里人清楚得多。有些面上的事，是按照标签做的，比如一开大会，就叫四类分子在台下站成一排，村干部先对他们训上几句报纸话，然后开会。可是，一到节骨眼上，到了关键的活儿，就不按标签办了。村里有两个地主最有名，大地主、二地主。春天扶耒，种子入土深浅至关重要，二地主是好手，每年都让他干。盖房子，地基最重要，要坚固而均衡，大地主是好手，叫他干放心。……我的基本看法是：知青与老乡比较起来，老乡分量重，知青分量轻。知青其实是个肤浅的群体，在他们身上做不出什么大文章。许多知青只会为自己诉苦，却不知为农民诉苦，自己受苦是冤枉，农民受苦是该着。当然，知青中也有对农村的事真有领悟的人（像张木生那样的）。这样的人或能将农村基层生活转化为一种思想资源，认识中国社会。”²

农村文革期间的冲突很多时候并不具有所谓阶级斗争的意义，而只是农村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反映，虽然他们有时候也使用官方的语言来争取话语权，但其实质丝毫没有改变，许多地方的所谓阶级斗争是农村长期存在的宗族、家族之间的争斗，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利益之争。

高默波出生在江西省一个小村庄的贫苦家庭，1966年文革爆发时正上初中二年级。一个地理老师因为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而被学生贴大字报。他认为，对我们农村人来说，学校里有好多新鲜事，让我们好奇。比如教师独身就使我们觉得奇怪，我们数学老师个子高挑，虽说没多漂亮，但找个对象应该易如反掌；另一个女老师也是独身，还总是穿高跟鞋。这对我们农村人来说感觉挺怪的。还有教导主任黄某，胖的出奇，腆着个大肚子，跟我们这些皮包骨头的乡下人相比，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对老师很尊重，没人打老师，甚至也没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文革初期我目睹了唯一一次打人事件，是学生们殴打学校食堂兼仓库的管理员。村里的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离开农村，比如入伍和招工。高默波回到农村成为返乡知青。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成为打击对象。原因是因为读《水浒传》和偷家谱私藏有封建意识。1973年国家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他被推荐到厦门大学读英语。当时村里高徐两大家族明争暗斗，四清、文

¹ 唐晓峰：《难忘的1971》，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259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² 同上，第263页。

革等政治运动成为农村宗族争斗的一个借口。高默波被推荐上大学也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当时公社文教组负责推荐大学生的人名叫高常艳。巧的是，他名字的前两个字，恰恰跟我的本名高常范前面两个字一样。所以，当高常艳把他推荐到县教育局时，负责人竟然误以为他是高常艳的弟弟，而这位在选拔上掌有生杀大权的负责人，又正巧是高常艳在上饶师专的好同学。高默波认为从自己被打成一打三反分子和上大学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不少当代中国政治、社会运行和发展的道理。首先，政策和指示从最高层下达，到地方上执行时，可能已经跟原来的意愿和内容完全不一样了。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反革命活动、反投机倒把、反贪污、反铺张浪费。但高当时受的指控，和这些内容完全沾不上边。再者，再像高家村那样的农村小圈子里，宗族、族系的传统和意识，总在和明或暗地左右着政策执行和政府运作。从四清到文革，高家村的不同宗族，以及高姓和徐姓两家，一直在你争我斗。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一件事情上，不同的人大多有不同的感受和经历。我们谴责毛泽东时代用阶级斗争的教条来解释和指导一切，但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和经济条件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需求，这是不可否认的。¹

文革中农村的矛盾实际上是传统宗族关系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的延续，只不过外表上披上了文革的语言。《春风化雨集》上册中的《党啊，你的忠实儿子又归来》就反映了江西省都昌县大沙区黎明村宗族之间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可作为农村文革的典型。刘孔炼是1959年在全国各地先后上映过的一部纪录电影《这里没有冬天》的主角，任大沙区党委委员、和合公社副书记、黎明大队党支部书记，先后三次上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刘周朱的接见并合影。1965年11月刘孔炼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作为漏网富农押送回家，原因就是与同宗族大房刘锋刃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权力斗争，相互报复。《春风化雨集》上册载《巴林草原的血泪》（第222—229页）一文反映了内蒙古昭乌达盟北部巴林左旗乌兰套公社八一大队文革的情况。农民李树友因与他人过去有矛盾，在文革中被诬蔑为内人党黑线马队成员，一家四口被迫害致死。1968年10月，挖新内人党运动波及八一大队这个蒙汉杂居的地方。大队党支部书记宋振廷在队部召开挖肃运动骨干会议，会上，宋首先传达了上级部署的深挖、狠挖新内人党叛国集团的指示精神，之后，发动大家继续揭摆阶级斗争新动向。群专指挥修富说李树友是黑线马队骨干分子，当即被逮捕批斗。起因则是1965年夏天，当时担任大队马官的修富盗窃集体两匹马卖掉，得款一千多元。这件事是李树友向大队

¹ 高默波：《启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96—97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党支部揭发的，使修富受到了应有的处分，两人因此结下冤仇。修富曾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要让李树友全家斩草除根”。1968年10月到1969年5月，仅有120多户人家的八一大队，被诬蔑为新内人党的就有63人，其中14人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间，文革前在农村树立起的典型因批当权派受到牵连，受到迫害，对农村文革产生影响。和田县肖尔瓦克管理区就是一例。《粤北山区一宗骇人听闻的杀人案》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第464—468页，记载广东省连县山塘公社马占大队挟私报复杀人案反映了农村文革的实质和真相，与文革的上层斗争毫无共同之处，反映了农民阶层中争夺权力的现象，属于同一宗族的争斗。双方一方是原来的村干部，一方原不掌权，但是复员军人，曾担任大队职务。所用手段是在阶级成分上做文章，把对方打成漏网地主、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另一方则夺权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贫协主席，亦是利用暴力、人身伤害等手段。

家庭纠纷、邻里矛盾被看作阶级斗争的表现，无限上纲，为祸惨烈。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农村也制造了种种冤案。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因此被逼得家破人亡，所谓的群定、群审、群判更是荒唐至极。清理阶级队伍成为村人之间私怨私仇借机报复的借口。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夹河庙公社栾家大队，1968年7月许长家一家七口共同自杀的惨剧即是一例，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最大57岁，最小18岁。死时还写了三封遗书、辩白、抗争。农代会就可以对人判决。

由于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话语权，历史很少留下他们的声音和感受，但并不表示所有农民都会逆来顺受，缄默不语，不敢表达自己的诉求，公开追求自身的利益，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与态度。在文革中，也有一些地方的农民从本阶层利益、自身经历出发，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利益诉求。这些人虽然在农民阶层中属于极少数，但他们却呼出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心声。正是这种压抑已久的内心的渴望，在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形成一种气势磅礴、势不可挡的力量，推动最高层抛弃文革路线，实行全方位改革开放。

福建的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文革中农民阶层思想、行动的一个代表。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谢洪水，1949年才12岁，初小文化，土改时家里分了一块土地，对共产党感恩戴德。1960年家家户户断粮，全公社饿死四百多人。他外出寻活路，帮人打铁，被当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家里妻子离去，孩子饿死。直到

三自一包政策传下来，龙岩的农民才有了一条活路。因此，他和很多当地农民一样，热爱刘少奇。文革初，看到毛打倒刘，更对刘充满了同情。1966年10月，他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声称由刘少奇直接领导，进行秘密串联。读过中学的农民谢永祺1960年几乎饿死，积极响应。他们出版了两期《大众之声》小报，拟定了中央委员的名单，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还有早年在闽西领导革命、龙岩百姓熟悉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唯独没有毛泽东、林彪、江青，也没有他们自己。在他们编写的《军委秘件》中，强调“要跟刘少奇走”，“以人民利益为重”，“兴起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高潮”……

1967年5月，他们又专门印发了《口号、呼吁书》：起来争自由争幸福！坚决打消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反对统购统销！拥护交公粮，拥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中国共产党万岁！幸福委员会万岁！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刘主席万岁、万万岁！1967年6月，他们编写党章，主要内容是：我们坚决执行三自一包、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阶级、取消集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毛林集团，为人民争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虽然政府自1967年3月就开始立案，成立侦破工作队，幸福会却几乎成了半公开组织，近三百人参加了该会，农民入会的决心书上写明：“拥护刘少奇”，入会相片反面写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相邻的南靖县的农民闻讯，有的赶去要求参会。莆田、仙游等县，有农民自行搞起了幸福会。当侦破工作队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材料时，绝大多数会员公开针锋相对为刘少奇辩护。谢洪水、谢永祺被捕后，仍然抗辩说：“大跃进造成国家困难……那是毛主席的错，刘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转了困难局面。”公安人员问谢永祺为什么顽固，谢回答：不愿做刘少奇的叛徒。结果，谢洪水、谢永祺等19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广西等省亦有此类典型。

四 文革的受益者——农村干部群体

相对于文革以前的历次在农村的运动，农村干部相对来说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受益群体。他们在农村有特权，也不像城市里的干部那样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而且他们的子女可以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方式进入城市，摆脱农民的身份，成为城里人或在城里生活、工作。

李若建在《四清运动的潜功能》（载《折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一文中，提出了基层干部阶层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属于农民阶层中的

实际的权力控制者，也可以说是农民阶层中中的干部群体。建国后，形成了空前的社会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当中，直接面对平民百姓的是基层干部阶层。由于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民阶层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扮演与行为缺乏规范，导致了平民对他们怨气不少。同时由于对这一群体也缺乏选拔与管制的经验，也使得一部分基层干部素质低下，上级对其行为失控，因此群众运动中对基层干部干部的批判成为控制基层干部的重要方式之一。1949年以后，大多数政治运动都涉及基层干部，这体现出政府一方面离不开基层干部，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运动整肃基层干部的现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整体上没有城市社会动荡严重，对农村阶层干部的斗争没有对城市基层干部的斗争那么残酷。虽在文革期间，个别地区的农村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不过这些事件多是基层干部策划来对付所谓的阶级敌人，较少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是农民比城里人意见少，而是农民的怨气刚刚在四清运动中得到发泄。

四清运动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农村干部，其潜在的作用是平息农民对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不满。农村的四清运动主要是依靠外部力量，依靠大量工作队，利用农村对基层干部的不满，对农村利益格局进行重新分配，其做法与土改非常类似。四清运动以固定的模式进行，首先是由城镇派遣大量的工作队进入农村，实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其次对干部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整顿。再次是处理一部分基层干部，同时发展一部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入党，提拔一部分人当干部。在经济上，基层干部的贪污和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当普遍。大跃进和困难时期，是建国以来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最恶劣的时期。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一是侵犯人权，残害人身，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二是搜查没收群众的东西；三是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甚至严刑拷打；四是用辩论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甚至侮辱拷打；五是不让吃饭；六是强迫群众 屋沤肥；七是强迫群众掘坟挖尸，扩大耕地面积。¹

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成为大跃进等后果的替罪羊。为了平息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农村进行了几次运动，农村干部受到冲击。国外有学者认为，当时采取的策略是把灾难归咎于基层，认为是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低造成了灾难。刘少奇在大跃进后期对大跃进提出了一些批判性观点，在他看来，大跃进产生的问题与基层干部的问题相关，他认

¹ 魏明铎：《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全书》第98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为三分之一以上基层政权和许多城市企业的领导权已成为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民众因为大跃进而产生的对干部的仇恨心态是相当强烈的。文革期间，在批斗原甘肃省委书记汪锋时，一位造反派指责汪锋说：“1958年你不顾我们的死活，大刮浮夸风，害的好多人没有饭吃，家破人亡。”

下乡的知青也感觉到了农村基层干部的特殊，在当时的农村，不参加体力劳动就是在享受一种特权。叶维丽在《动荡的青春》中对其下乡的农村的干部与农民的区别有这样的记述：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干部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叫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¹

农村干部受益还表现在他们的子女能够摆脱农民身份，通过招工、推荐上大学等方式到城里工作，甚至成为城里人，实现身份的转化和社会阶层的跃升。潘鸣啸在《失落的一代》一书中，通过研究发现在文革十年间，下乡的知青与被招工进城的农民几乎一样多。“其实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数量是跟被下放农村的知青数量‘一样那么多’，或者是‘几乎一样那么多’，而且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都成功地在城里定居下来。”“根据后来比较的准确资料显示，那10年间共有1400万人招聘进城，其中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然而，这800多万来自农村的工人最后变成了‘固定工’。”这些被招工进城的农民，一部分是城镇干部、军宣队的军队干部的亲属，“事实上，这类招工的发展使许多城镇干部罔顾禁止任意迁居的法例，利用他们的关系网，将他们的亲属全部从农村弄到城里来。而‘解放军宣传队’的部队干部在这方面就做得更绝了，无人不知，他们从1968年起在城镇基层行政单位耀武扬威多年。”而大部分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亲属、子女等。一旦被招为临时工、合同工，他们则又千方百计将其变成固定工。1971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根据这个文件，1971年和1972年两年间，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被转了正（当时一共有900多万这类工人），其中有的根本就不是真的工人，而是他们的家属。就算后来原则

¹ 叶维丽、马笑冬：《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186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上禁止这类转正，仍然有大量农村来的工人转成固定工。以1966-1976年这10年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有800万，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低估了。¹

招工进城的农民主要是农村干部的亲属子女及其与他们有各种关系的人。弗里曼等所著的《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以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对农村干部拼命将其子女亲属通过招工等形式安排进城市的记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耿长喜是饶阳县五公村合作社社长，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子女则依靠其地位和特权成为干部或者工人。弗里曼等认为：“对城市工人和国家干部，国家给予养老金和福利，并提供很多的津贴，但却没有系统的福利。囊中羞涩的农民们只得自谋生路或逆来顺受。”“国家职工意味着有相对优厚的报酬、免费医疗、养老金，不必在地里干危险和艰苦的活儿，人们称之为‘吃皇粮的人’。大部分在外县工作的人，每年只能回家一到两次，总共三周，但农村家庭还是千方百计去谋得一个国家职工的位置。”²

在文革中，也有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因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民而与文革政策不相符合的办法而受到批判。在文革中，有些农村干部因地制宜，发展副业，被当作走资派撤职、批斗。福建省漳州城郊公社前锋大队是紧靠漳州市区的农业大队，每人平均仅有三分七厘耕地，1964年前每人纯收入只有70元，吃国家5万斤返销粮。大队党支部发挥村里生产冰糖的优势，办起了冰糖加工厂、炉灶厂、笋菜加工厂、耕山队、果林场、养鱼场。到1968年交售国家6万多斤余粮，社员口粮达到560斤。全队工副业收入24万元，占农工副总收入的67%。1969年前锋大队被当作副业收入大于农业，破坏以粮为纲的黑典型、活靶子，强加了三条罪状：一、队办工副业是以钱为纲；二、不务正业，弃农经商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三、支部书记颜亚洲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忠实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冰糖厂被诬蔑为内外勾结的黑工厂。1969年9月，一支30多人的宣传队、十多个全副武装的人员查封了冰糖加工厂。颜亚洲等被拘留审查。漳州《三代会报》以醒目的标题刊登《彻底砸烂前锋冰糖厂》的报道和《让红色风暴来得更猛烈吧》的评论员文章，《福建日报》同时转发冰糖厂被砸的消息。颜亚洲多次申诉被说成是“颜亚洲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红色政权，破坏一打三反运动。”

¹ 【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第53—5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

² 弗里曼等著：《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家》第2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78年9月20日，中共漳州市委召开万人大会，为冰糖厂平反。¹

五 文革的深度参与者：农民阶层的学生群体

一般来说，农民阶层的绝大部分人生活于与城市隔绝的状态，他们对城市的了解支离破碎，但对城里人的羡慕和向往却是一致的。农民阶层中的一些青年学生，特别是大中专学生，是与农民阶层之外的社会阶层接触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对农民阶层地位低下、生活困苦最为了解的一个群体。这些人虽然自入学之日起就注定会脱离农民阶层，进入新的社会阶层，但作为农民阶层的子弟，仍然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农民阶层的立场看待文革，成为农民阶层不自觉的代言人，虽然他们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人由于其所处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在与其他阶层相处中对农民阶层的地位有切身感受，对于号召造反，把干部阶层作为斗争对象的文革抱有些许希望，很多在文革中加入了造反的行列，并产生了改造社会结构，提升自我出身阶层地位的强烈愿望，更容易接受毛泽东的追求公平平等的思想。文革中许多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属于农民阶层中的学生群体。

在中学，在城乡结合的县城中学是城市学生和农村学生接触最多的学校，这个表现也最为明显。陈家琪在《执著与迷惘——作为一种个人思想与情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谈到社会不公，不仅只就黑五类及其子女而言，那些出身贫雇农的学生，解放这么多年了，依旧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们又该何以解释眼前的一切，特别是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异？咸林中学最先起来造工作组的反，矛头直指县委的造反派头头就是雇农成分。当我看着他们穿的衣服，吃的食物，听着他们说的话，感受到那种不计个人得失而只关心国家的气概时，真仿佛置身于解放后大量文艺作品中所告诉我们的那种贫下中农渴望跟着共产党翻身求解放的气氛之中……县城里的中学生与城里学生的不同之处此时也更明显了。与城里的同学比较起来，这里的朋友更现实，也更懂得怎样用手中的权力实事，这实事主要指的是诸如春耕、秋收、抗洪、筑坝之类的事；但于我，却也同时更多感受到了权谋、利益、私欲对人的左右。²

文革初期大学中农民阶层出身的大学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群体，他们大都加入了造反的行列，特别是一些调干生，著名造反学生领袖蒯大富、王大宾都是农民阶层的子弟，各省造反学生领袖中也有许多这样的人。如山东的国恕连、王竹泉、张宗鲁等。一些造

¹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上册，第121—125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

² 陈家琪：《执著与迷惘——作为一种个人思想与情感经历的文化大革命》，载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第307—3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反派是关心政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独立见解的人。他们对问题的认识深刻，对以往的政治运动亦有自己的看法，与学校一般把听话和遵守纪律看作是最基本的革命美德截然相反。

1973年之后，所谓招收工农兵学员，只不过是原来的社会优势阶层脱离农村的一个手段。周雪光认为，1972到1976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¹这里所说的干部应当包括属于农民阶层的农村基层干部。高默波在《启程》一文写道：虽说招的是工农兵学员，但1973年那届真正农村人就我一个。大多数是上海知青，主要是从国营农场选拔上来的，工人出身的居多。至于当兵的学员就别提了，学外语的尽是部队来的军干子弟，上山下乡时他们入伍，一转身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他们养尊处优，学习没动力。²

在文革时期，农民阶层流动到其他阶层还有一个通道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一些农民改变了阶层隶属，向上流动，这部分人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的子女。如叶维丽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就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北京郊区的农村子弟，一类是从各地返城的北京知青。由于背景不同。所属阶层不同、文化水平差异。虽然返城知青在农村插队多年，但两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两类人之间存在矛盾。叶维丽感叹，在我过去的经历中，是城里人歧视农村人，农民在社会的底层。我现在经历的是倒过来的歧视，这对我确实是新的体验。城乡差别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在中国是个沉重冷酷的基本现实。城乡之间的鸿沟，不是仅仅有善良天真的愿望就能逾越的，他有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贯穿我三年大学生活的一个大痛苦，也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到了大学还不让读书？在1975年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农村同学，特别是那些党员干部，在发言时往往理直气壮，他们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后代，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不共戴天，是天生的革命派。而返城知青呢，也非常聪明。他们有了农村插队的经历，成为了工农兵学员，而作为工农兵学员就意味着他们取得了改造和批判别人的资格，所以他们批判起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也同样激昂慷慨。对城市和农村同学之间的矛盾，我也感到不理解。一个和我关系不错的农村同学跟我说，这些能到城里来上学的个个都有背景。进了大学后，他们感到在学习上不如城里同学，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当时拼命提高工农兵权威的做法使他们有政治上

¹ 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第8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

² 高默波：《启程——一个农村孩子关于七十年代的记忆》，载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第102页，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的优势，其中一部分人就集中使用这个优势，这也助长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左。¹属于农民阶层的农村大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们对实际地位低下的社会身份的捍卫，对社会分层的不满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蒯大富是农民阶层子弟在文革中的典型代表。他属于在文革中受益的农村干部群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绝大部分农村出身学生对文革的态度，当然也有例外。蒯大富1945年9月13日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他的爷爷是贫农成分，当过新四军。其父母1944年入党，其父当过大队长、大队会计等。蒯大富干过农活。家庭人口多，挣工分困难。蒯大富上的中学为几个镇的联合中学。但其老师中许多是因右派或右倾从城里下放的，水平很高。“我小时候有点好打抱不平，同情弱者。看到不平事就想说话，而且很讨厌说假话的人。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对政治上的事感兴趣。”² 他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6年6月初因发表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被关押和批斗，后平反，成为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的主要负责人。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蒯大富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四人帮”倒台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获释。

山东大学物理系学生、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张宗鲁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解放前一家人在饥寒交迫中度日。解放后，张宗鲁的父亲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生产队长、大队长。不抽烟、不喝酒，深得社员们的信任和拥护，却常常遭到多吃多占的干部们的攻击。1957年有的干部贿赂上一级领导，对他诬陷，在其祖叔的指导下，其父口述，让张宗鲁写状子、大字报进行反击。1958年其父反对过五风，受过批斗，但随后就得到领导的保护和重用。后来他的提议得到采纳，没有没收自留地的出产，保护了一方社员，比较顺利的度过了困难时期。

文革中，张宗鲁坚持为山工联平反，被监禁，在上级来信的情况下，父亲退出大队领导岗位。张宗鲁的父亲没有上过学，年轻时就喜欢看戏、听古书，忠孝节义思想严重，名誉思想强，经常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宗鲁初中时开始写日记。大学在勤

¹ 叶维丽、马笑冬：《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210—214页，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² 参考《华夏文摘增刊》第七八期、第七八八期蒯大富口述、米鹤都、张琦采写《岁月流沙》上、下。

工俭学试点班。张宗鲁政治热情高，大学一年级用大半年时间一字不落读毛选四卷，并逐篇作了笔记。此后，还看了《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等马列著作，曾耽误过课本的学习，受到老师和同学非议。大学一年级政治课学党史，相当长时间用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学习和讨论上，老师曾提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以前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现在怎样分析？长期让同学们讨论。在讨论中，张宗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文革开始后，张宗鲁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在防修防变防止工人农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思想指导下，投身进去。1966年6月之后，张宗鲁积极看大字报，有时还做记录，并积极将自己的意见、看法，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去。文革初起时，他就写了三篇批判保守思想体系的大字报，接着他一个人办了油印小报《战斗》，在系内分发，其中写了《革命之研究》连载三期。此后，他经常有感而发写些杂文，用大字报张贴出去。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每天都有他的大字报，成为写大字报很多的人。听说毛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在全校各系串联，组织红卫兵。青岛事件时，参加了支持青岛文革的活动，返校后加入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尖刀班中去。山东大学的十几位同学成立了驻省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改为红色敢死队。省委为了撵走他们，不让他们去省委伙房吃饭，引发了绝食斗争。他们绝食几天后，山大、其他院校、工人、市民中的许多人都到省委看望他们，在省委大院召开了批判省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文革大串连时，张宗鲁步行到韶山、长沙参观毛活动旧址。张宗鲁被学校领导整了黑材料。红二三红卫兵、原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进去，并立即占据了学校的领导地位。

反逆流时，张宗鲁等人写了《必须释放某某某等革命同志》，分别贴到省革委、省军区、公安厅门口，并在马路两旁刷上平反、要人的标语，这一行动轰动了济南市。在张等贴出大字报后，有几个中学的学生找到他们，就联合创办了油印小报《革命风暴》，每期印一二百份。在上面刊载了张宗鲁写的《创刊词》《论二月失败》《知识分子的叛卖性》《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还有其他人写的长文。每一期都送省革委一份，省革委也专门成立小组搜集他们的小报、传单、标语等。七八月份平反运动进入高潮，王效禹通过校革命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压制他们，平反斗争也曾低落了一个时期。为山工联平反的张宗鲁成为学校压制的对象。829

事件使山东等一些学校的学生离开学校，流落外地。张宗鲁被抓进棒子队，被打得全身浮肿，青一块紫一块，关押几天后逃出。有人提出成立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的倡议，张宗鲁在几个翻案兵的聚会上读了这一传单，有人不同意也就作罢。后来反对的人报告给王效禹。1968年2月到1969年1月，将他们抓到省革命委直属看守所，关押近一年。

王效禹将他们监禁后，捏造了莫须有的渤海战团反康生、反中央文革等罪名，说张宗鲁是渤海战团的头头，捏造事实办了展览，组织济南市的群众轮流参观，从而将文革势力再一次镇压下去。事实上，他连渤海战团是什么都不知道。1969年他被开除学籍，同年12月25日被拘押，1970年2月26日逮捕。九大后王效禹倒台，学校曾准备以张宗鲁为代表公开平反，又因反林彪而被拘禁。九大之后，他写了《告全省人民书》，力主对“山工联”等公开平反，之后又写了《极左派万岁》《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与解体》等五篇文章。；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拉拢他人刻印散发，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组织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1976年，他被滕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79年底放，遣返原籍后不断信访、上访。

张宗鲁是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者的狂热追随者，他对公有制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将名义的公有制改造成事实的公有制，就是文化革命的任务。”他认为文革的目的是“教会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放手让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张宗鲁认为毛泽东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总结概括时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正确的。他主张把斗争的矛头对准整个干部阶层，是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农民阶层的思想代表，改变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争取平等地位。张宗鲁对何谓革命，何谓反革命有自己的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完全相反，虽符合革命的定义，但与当时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从根本上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张宗鲁的思想属于阶级关系变动论的范畴。他对于革命的理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理解的，认为干部阶层、政权机构是文革的对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革命”革命对象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和法权”，共产党内部产生出一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公有制的幼芽，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主要的社会力量，因此这时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成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表现形式。张宗鲁认为：文革的实质是用公共所有权代替国家法权管理一切公共事务。由这种实质确定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并且只剥夺革命的对象们使用社会职业暴力——即国家法权管理所有人的特权，并不剥夺他们的公共所有权，不降低他们的物质生活待遇，必要时还要增加和优待，因为他们在民主革命和社

会主义革命中有过功劳。

《极左派万岁》的主要理论是阶级关系变动论，“处于国家机构中，使用法权确保行使资本职能的大官们构成的社会集团。”在《极左派万岁》中使用了特权阶级这个名词。特权阶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阶级关系变动论的主张否定了现存社会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是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否定，是毛泽东所不允许的。但这一观点确实又是毛泽东某些观点、思想的深化、延伸。《特权制社会的替代者》提出了“民权制社会”的概念。就是民众行使公共所有权管理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当时的社会还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系统。民权制社会是巴黎公社原则的具体化。《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的教训》、《极左派小组组织法》只有一百多字。张宗鲁认为群众组织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根本权力——公有所有权决定的民众行使主人权力的基本形式。张宗鲁提出了“毛泽东后期思想”这个概念，值得重视。

农民阶层中有一部分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体制倾向，对当时的政权和社会持否定态度，主张彻底改造，对当时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部分人成为毛泽东文革派的积极支持者，成为极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蒯大富、张宗鲁均属于这类人物。他们有的有独立思想，有的是只因个人际遇，争个人权益，对社会的关注程度低。他们的思想来源较为单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他们对社会真实状况，特别是农民阶层的生活有深得体验和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阶层的诉求、愿望和对文革的态度。杨小凯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真实状况和思想（见《牛鬼蛇神录》），但他的思想来源多元化，看了很多其他流派的书籍，从而走向另一条不同于蒯大富等的道路。

唐少杰认为：“文革的全部问题都离不开群众问题。人民群众不仅使文革在规模、范围、意义、影响等方面成为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群众运动，而且他们本身就是文革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文革历史的创造和推动包含了他们在文革中的自身演变、自身反省和自身批判。文革时期的群众思潮和派性斗争表明，群众问题从根本上使文革具有了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利益驱动和利益分化的色彩，并且对文革的命运注入了难以逆转的因素。”¹农民阶层虽然是文革的边缘阶层，但这一阶层的数量是如此之巨大，对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¹ 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史稿刍议》，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6期。

【评论】

中央将打死人列为红卫兵战果吗？

印红标

几篇揭露红卫兵暴行的文章提到：1966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两个材料将红卫兵打死人列入“辉煌战果”，文章流传多年未见质疑¹。本文认为，对红卫兵暴力需要继续揭露和谴责。但根据现有资料考订，上述文章是一种误判或过度解读。

一篇文章开篇即称：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²

同一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说：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份内部文件，标题为《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并说：这份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³为叙述简洁，本文将此说法简称为“战果说”。

中央在限定范围内部印发的这两份资料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赞许有加，这是完全错误的，然而是否将红卫兵打死人也列入“战果”却有必要核准，因为这涉及中共中央对红卫兵及群众运动中暴力行为的政策，带有全局性。这两份历史资料至今没有公开，上述文章作者应当没有读到，笔者同样无缘阅览。不过，这不妨碍研究者对比参照其他资料做出合理的推断。

一 中央对红卫兵破四旧行为区别对待的政策

对于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出现的大量违反当时的法规和政策的行为，中共中央文革领导当局的政策是差别对待。从现有资料⁴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对于红卫兵和学生提出并强制推行的禁止某些服装、头发式样、修改商店名称、街道名称之类“移风易俗”的“革命化”倡议，中央明确表示赞赏和支持。⁵同时，对

¹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王友琴：《红八月与红卫兵》，（2009-09-03）<http://www.aisixiang.com/data/29909.html>

² 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³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⁴ 现有资料包括：中央文件、“首长讲话”、官方传媒、口述回忆等。

⁵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以及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此后官方媒体陆续发表赞颂红卫兵在文化风俗方面“破四旧”的文章。

于某些太过荒唐、违背重大政策的要求，予以劝阻，例如：对部分学生提出的以红色为交通通行信号¹，以及取消伊斯兰教²等要求。

2. 对于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的抄家行动，即搜查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其他“牛鬼蛇神”的住处及没收财产；驱逐上述人员及其未成年子女离开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行动，中央给予实际支持，同时要求注意政策上区别对待。官方传媒上对于抄家仅做有限的委婉报道，³对于驱逐未予报道。城镇公安部门和街道居民委员会遵照党政领导的指示，配合和引导了红卫兵上述行动。

吴德（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回忆，毛泽东在听取关于北京红卫兵“破四旧”的汇报后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⁴

至于在红卫兵抄家和驱逐行动的幕后，中央和地方领导当局的具体指示和作用，已有所披露，但仍需进一步探究。

3. 对于打人、打人致死的行为，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不赞同，不支持，但是阶段性地姑息、放纵、庇护。具体地说，中央明示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但是对红卫兵打人，通常止于劝阻，不予追究，打人致死也不予惩处。只是当暴力恶性膨胀，危及运动推进时，才明令批评和禁止，但仍然不予惩治。官方传媒上不报道打人，更不必说打死人的消息。

吴德回忆：在北京市发生大批打死人的情况下，毛泽东曾经否定谢富治为公安部草拟的制止打死人现象的通知。毛泽东批评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吴德说，这是在1967年春，但是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在1966年8月下旬，甚至可以推定是在26日。⁵有资料表明，毛泽东在大约两三天

¹ 1966年9月10日，周恩来在一次红卫兵座谈会上提到，曾经劝北京十五中的学生放弃交通红绿灯信号的倡议。这些学生要求绿灯停，红灯放行。见《周总理在第二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编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2辑，第9-17页。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这篇讲话的另一个记录文本。

²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学生时谈到：不同意“彻底消灭伊斯兰”的大字报。见《周总理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摘要》，同上资料集，第9-61页。《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这篇讲话。

³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9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称：“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⁴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实——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7页。

⁵ 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实——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8-29页。吴德的这部回忆录有事实错讹、时间颠倒之处。吴德称：毛泽东批评谢富治为公安部门草拟制止打死人现象的通知，时间是1967年春。但是，根据该回忆录前后文及其他资料，笔者认为：应当发生在1966年8月下旬，参照谢富治26日对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很可能发生在8月26日。25日北京市发生被抄家的居民刀砍红卫兵事件，从25日开始，红卫兵暴力疯狂升级，被打死的人数激增。这很可能促使谢富治草拟通知以制止打死人。

后（28-29日）态度转变，再提要文斗，随之中央及北京市等地领导表态，坚决地制止打死人的现象（见下文）。

应当指出，中央在纵容施暴红卫兵和群众的时候，也没有将打死人当作可以提倡或鼓励的行为。

二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9月5日简报

“战果说”称：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副标题“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这份简报是否将打死人当作红卫兵的战果？其次，简报是否提到8月底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

1. “战果”是否包括打死人

仅仅根据副标题“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¹及已经打死上千人的情况，就能断定“简报”所说“战果”包括红卫兵打死人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除非中央对红卫兵的行为（包括打死人）照单全收，一概赞赏，而中央的态度并非如此。诸多迹象表明：中央对红卫兵的行为是区别对待的，即支持改店铺招牌、抄家、驱逐等行动，但没有赞赏打人致死。仅仅从简报的题目就推论：打死人被当作红卫兵战果，未免失之轻率。

再看历史事实。如果这个“简报”确实印发于9月5日，那么这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社论恰恰是《用文斗，不用武斗》。社论开宗明义，清晰地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结尾处再次强调：“用文斗，不用武斗，这是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政策，贯彻执行这个政策。”就在《人民日报》强调不用武斗的当天，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偏偏要与其唱反调，把打死人列入战果，这可能吗？

“战果说”也与当时的事态发展相左。8月20日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开始，不久就发生打人现象，甚至打人致死。起初，中央只是温和地劝阻。²但是27日之后，随着打人行为和打死人的现象疯狂蔓延，中央制止打人（武斗）的态度日益明确、坚决。

¹ 简报的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周总理》编辑组：《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84页。

² 1966年8月24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谈话，见：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团等编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第1辑，第8-75页。又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月25日，针对逐渐蔓延的打人现象，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在接见群众时说：“不要打人，文斗嘛！”“没有道理才打人。对打人要采取教育批评。”“以后不要再打了。”¹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市榄杆市发生被抄家市民刀砍红卫兵事件之后，红卫兵疯狂报复，打死人数字急剧上升。次日（26日），谢富治的两个讲话值得注意，一个是在北京政法学院对学生和群众的讲话，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个讲话是对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了也就算了。”²这反映了中央的政策：一方面继续声明“要文斗，不要武斗”，另一方面对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红卫兵不予追究。根据上述吴德的回忆，这个政策应当来自毛泽东，由中央及各地党政领导执行。

此间，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如何？8月26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给副组长江青写报告，表达了对红卫兵打人等违反政策行为的担忧。报告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八月十八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报告还谈到其他一些问题。³很清楚：中央文革小组是将打人当作“缺点”、“副作用”的，是认为应当纠正的，而不是予以赞赏的“战果”。

次日（27日），关锋、戚本禹的这个报告经江青转达到毛泽东。同日，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的数字继续上升，想必引起毛泽东的关注。8月28日上午，毛泽东批示：“此件（指关锋、戚本禹的报告——引者注）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及薄一波、陶鲁笏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⁴

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度对武斗表态，显然针对运动的新动向：“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林彪讲得很清楚，形势

¹ 1966年8月25日，陶铸在接见卫生部和北京中医学院群众时的讲话，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² 《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同志对政法学院做的八点指示》，《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讲话》，联合编辑组：《首长讲话选编（1966年6月至10月）》（群众自印出版物），第68-69页。前一篇讲话又见《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后一篇讲话的部分内容（文句有差别）被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引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其资料来源是同兴：《十年浩劫，京城血泪》，刊载于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编辑出版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³ 毛泽东：《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1966年8月28日）的注释（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13-114页。

⁴ 同上。

很好，但不包括打人，要“去掉”打人。毛泽东的意见马上得到贯彻。¹

之后，林彪8月31日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进一步明确：“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² 照例，林彪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9月2日，北京市委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禁止向群众提供所谓流氓和五类分子名单。³

9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

鉴于上述资料，中央文革小组9月5日的简讯怎么可能在中央着力制止武斗的情况下，违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自己的意见，把红卫兵打死人列为战果？

2. “简报”是否提到打死上千人

“战果说”称：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但是没有提供资料依据。⁴关于这个简报和北京市打死上千人，雍文涛有过回忆，不知“战果说”是否依据这个回忆。

文革最初半年雍文涛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和中宣部副部长，并兼任北京新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市委书记，他回忆说：“据9月5日的统计，8月底止，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被抄家的1万多户。”他说的是“据9月5日的统计”，并没有说据同日中央文革印发的简报。在这篇回忆中，统计与简报不是连续，而是分别在两处讲述的。雍文涛说：简报称红卫兵的“战果是‘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扫除了封建迷信’、‘消灭了资本主义’”。他在回忆简报内容时没有提到打死人。⁵因此，他说的打死人的统计数字是否刊载于简报，即这一期简报是否提到打死上千人？如何叙述的，是否当作成果？都有待证实。

从根本上说，文革的目标和方式不是打人，更不是打死人，文革的基本政策之一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三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文件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39页。

² 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

³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北京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北京党史资料通讯》增刊（17），1987年5月。

⁴ 王友琴：《恐怖的红八月》，《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

⁵ 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周总理》编辑组：《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84页。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参考资料之四，题为《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战果说”认为：这个标题就表明了把红卫兵打死人当作革命功绩看待。¹不知论者是否意识到：这个推论犯了评说中央文革小组9月5日简报时同样的逻辑错误，欠缺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央赞赏红卫兵的一切行为。事实如前所述：中央对红卫兵的行为是有选择的支持，有过姑息纵容，但是并不赞赏打人，更不必说打死人。

行文至此，产生一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难道标题“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当中政治打击意义的“打”字，被解读为殴打、打人的“打”？标题显然脱胎于《国际歌》歌词“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熟悉当时政治语汇的人恐怕不会将打碎旧世界的“打”简单解读为打人。

据王年一著《大动荡的年代》披露，中央工作会议印发的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内容有“把资产阶级打得威风扫地”、“挖出了一批潜藏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扫除宗教迷信，捣毁教堂寺院”、“没收了一批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等事项。有关统计数字“截至10月3日为止。”²该书引述部分没有提到打死人。

中央工作会议的这份资料至今没有公开。但会议之后，新华社内部通讯摘要刊发了红卫兵的“战果”清单，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报刊上也出现类似内容，流传很广。

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1966年11月25日第3835期发表文章《全国红卫兵横扫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罗列了“截至十月十三日³红卫兵战果的统计数字”。作为“成果”列出的有四类、多项，每一项都有具体数字，应当是转发了10月中央工作会议那份资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基本内容，包括：

“一、挖出一批暗藏的敌人”，包括：“漏网的地主、富农分子、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等（此处及以下各项均有数字，本文略）。

“二、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反动证件”，包括：查获收发报机、六〇炮、土炮、机枪、长短枪、土枪、炮弹、手榴弹、子弹、炸药、雷管、战刀、匕首、毒药、“变天账”、房地契、反动证件、反动旗帜和“蒋匪”像、反动及黄色书刊、大烟土。

“三、从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包括：缴获黄金、白银、银元、美钞、英镑和其他外币，各种金银首饰，现款、存折、公债，手表、收音机、缝纫机、自行车等，绸缎布匹、大批其他衣物家具、古玩、玉器、字画。

“四、从城市赶走了大批牛鬼蛇神”，包括：从全国城市赶往农村的地、富、反、

¹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

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104-105页。据统计，全国各城市截至10月3日为止。

³ 10月13日这个日期似乎应当是10月3日之误。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1996年版，第104页的叙述和下文引述的1966年12月清华大学《114通讯》编印的资料，日期均为10月3日。

坏、右五类分子，外迁反动资本家、小业主，房产主及其他牛鬼蛇神。

“五、一部分反坏分子迫于形势自动缴械”。

全文没有提到打死人之事。

群众组织出版物也报道了10月工作会议关于红卫兵战果的内容。实例之一是：清华大学学生主编的油印动态《114通讯》在1966年12月27日第“3-50”页及后续一页，以《红卫兵扫四旧的辉煌战果》为题刊登来自10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消息。《114通讯》按：“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宣布了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战果（截止10月3日）。从这些数据足以看出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巨大贡献。”这一期《114通讯》注明：“听传达报告，用速记方式记下，数字基本正确”。对比上文引述的新华社内部信息，数据分类一致，统计数字基本吻合，¹可以推测信息同源，即10月中央工作会议材料。这一期动态还注明了传抄情况：“钢铁学院复原转业军人红卫兵抄，体院铁骑兵转抄，清华大学工会职工部再转抄，12.23。”传抄情况说明“红卫兵战果”相关内容流传很广。

以上三份资料的全文或摘要所开列的红卫兵战果不可不谓详细，唯独未见打人或打死人一项。

关于这份资料的另一个问题是：该文件是否提到红卫兵在北京打死1,772人？“战果说”称：10月工作会议印发的“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但是没有注出资料依据。²关于红卫兵和其他人在北京打死1,772人的数字，据《大动乱的年代》的注释，来自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的附件，这份文件的主题是揭露和批判谢富治³。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在一篇批判谢富治的文章中披露了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至于这个统计数字产生的时间，并不清楚。

现有资料，不论新华社资料，还是群众出版物均没提到，文革后的引述也没有提及10月中央工作会议印发的资料将打人和打死人列为红卫兵“战果”，而打死1,772人这个数字见于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份文件的可能性更是微小。故这里提出质疑和求证。

结 论

综上所述，1966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中出现的种种

¹ 33个数字当中，有5-6个数字不一致：多一个或少一个“0”，以及“5”与“3”，“6”与“9”之差，显然是抄写或记录时产生的误差。


² 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47.html>

³ 《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的注释。

严重危害社会的行径，采取了根本错误的政策，但也是有差别的：对于改名、禁止某些习俗的作法，基本予以公开赞赏；对于抄家、驱逐，予以鼓励和推进，但在官方传媒中模糊报道或完全遮盖；对于打人甚至打死人，则在劝阻的同时，予以阶段性的姑息、纵容和庇护，但不予赞许和支持。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9月5日简报和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参考资料之四《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将打人、打死人列为红卫兵“战果”的说法缺乏资料依据，与至今为止披露的资料不符，应当是一种误判或过度解读。此外，这两份文件提及北京市有上千人或1,772人被打死之说，缺少证据，可能性比较低。

对红卫兵和群体暴行的揭露和谴责非常必要，但学术研究应力求严谨、准确才有说服力。本文考察的细节与中共中央重要政策相关，有必要细究。

关于这两份资料内容的商榷源于历史档案的封闭。日后资料公布，相关争议自然冰释。但是研究者不能遥遥无期地等待，故提出辨析，望同仁批评指正。 

【红色文化】

求爱与做爱

——政治语言的泛化

烏紫拉

黄子平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种橡胶。一日，女兵团战士阿凤气鼓鼓地走来，把一张折成了菱形的纸条塞到他的战友四眼手里。战友们起哄，追问四眼是什么是什么。四眼坦然相告，阿凤把我写的情书退了回来。那年月，没人敢写情书。四眼的色胆包天引发了战友们的雅兴，大伙发一声喊，把四眼按到在地，从他裤袋里往掏那纸条。四眼扶扶眼镜：你们想看，好，我这情书完全可以公开。大家展纸一看，那上面没有一字情话，有的只是三条“最高指示”：

- 1、“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 2、“要互通情报。”
- 3、“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黄子平说明这三条的出处，解释它们在这里的意思：第一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出自《为人民服务》。“四眼的目标当然是要跟阿凤走到一起，可到底是不是阿凤‘共同目标’呢？于是来了第二条，这一条出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原是党委们之

间保持信息通畅，不能藏着掖着把机密当私货。四眼的意思是希望阿凤给个回音，‘情报’的‘情’字在这里完全用活了，不是‘情况’，而是‘情意’。第三条出自七十年代的‘最新指示’，绝对是断章取义，完整的版本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四眼把血淋淋的上半句隐去，下半句用于谈恋爱，千万别放松，同时要隐秘进行，这辩证的叮咛又是何等贴切。”

四眼的战友们佩服他的活学活用。因为他们一看这三条，马上就明白了其言外之意，黄子平告诉我们，这言外之意之产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用以表述某领域的词汇匮乏，不得不挪用其他领域的语言词汇救急。七十年代，表达情爱的语言全部成了四旧或小资，“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用来言说男女之事的词汇只剩下了最单纯的‘好’，说谁谁谁跟谁谁谁‘好’上了。很早就从政治领域挪用政治词汇的程序。譬如，‘找对象’……‘解决个人问题’。”“二是作者和读者对此一被挪用的语言词汇非常熟悉，熟悉到了能够融会贯通的程度。……在泛政治化的七十年代，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人人都熟得不能再熟，随时挪用都能产生多重隐喻。”黄子平举了一个例子，兵团机务连的指导员淫辱了女战士，关在团部招待所写交代。多人围观。一司机嚷嚷：“嘿，这家伙，还真能改善生活哩！”众大笑。

后来，四眼和阿凤终成眷属，那三条最高指示被放在红木镜框中，挂在墙上。其最后一条“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此时则有另一番意思了。¹

政治语言直接等同于日常语言，相当于政治入侵民宅。遥想当年，入侵者似乎除了政治，还有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免不了要把战火硝烟带到社会生活里去。五十年代，老师让学生用“如果……就”造句。我的同桌写道：“如果我上了战场，就会像黄继光一样，用胸口堵住敌人的炮眼。”六十年代，我的同桌在作文里写道：“在我们家，无论干什么，我妈都是主力部队，我爸都是后勤，我和我哥都是预备队。”七十年代，军宣队要求某女士给她的丈夫——所谓的“五一六”骨干办家庭学习班，这位贤妻正告她那不幸的男人：“你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之中，赶紧缴械投降吧！”说完了，递给他一学习材料——《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战争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家庭生活中，最高表现的机会不多。所以还是政治语言更常用，更普及，也更有市场。前面说了一个用语录求爱的故事，这里说一个与毛著有关的夫妻做爱的逸闻。

话说李师傅有一手高超的钳工手艺，本来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只因他在伪

¹ 黄子平：《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见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页324-326，三联，2009。

满时当过几天日语翻译，文革一来，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入狱过堂，审问判刑，自不必说。好在他靠拢政府，积极改造，熬到了刑满。当时的政策是刑满之后留厂就业，李师傅留下来，施展他的钳工手艺。不久，他在当地农村找了个对象，当了个倒踏门女婿。按规定，留厂就业人员享有公民权，每周有假日一天。因此，这李师傅每逢周末必喜滋滋地回家，一享鱼水之欢，云雨之乐。

天有不测风云，“批林批孔”来了。这李师傅到了周末该回家的时候，突然从以前的喜形于色变成了长吁短叹。好事者一打探，原来他老婆要跟他离婚。为什么呢？好事者深入调查，才知道端底——李师傅每当上床后，必先向女方汇报学毛著之心得，批林批孔之体会，然后，方能顺利行房。而其妻对这种汇报不胜其烦，多次劝阻无效，终至忍无可忍，提出离婚。李师傅大为震怒，理直气壮地找厂里，要求领导出面调解。没想到，厂里一听这事，一推六二五。李师傅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忍痛离了。¹

以上说的都是四十年前的事，那时候，政治话语是主流的主流，泛滥到男女之事，并不为怪，奇怪的是在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了至今，政治语言遗风不减，竟深入到了佛家圣地。

2013年秋，我到广东肇庆，四会市朋友一定要我去参观“六祖禅寺”。我对六祖慧能的事迹略知一二，自然欣然前往。一边在前后大殿、厢房、廊庑乱走，一边听朋友介绍重建此寺的大愿法师。此位佛界高僧是七零后（1971年出生于湖南），慧根早成，19岁即抛弃了湖南财经学院的学业，皈依佛门。殿前的小摊上有这位法师的画像，圆脸圆鼻，鼻子上架了一副白边眼镜，黄袈裟配上白里透红的脸膛，仿佛是一位养尊处优的官僚。朋友纠正我的大不敬，说，大愿法师受过多位高僧指点，是有知识有理想有事业心的佛界新秀，从湖南到广东担任多种重要职务。他主持的“六祖禅寺”更是名声远播，南韩的崇山长老，对他推崇备至，曾亲授法卷。大愿法师闭关修行，得其上师真传，获不思議境界云云。

我问朋友，什么是不思議境界？朋友以己之昏昏，使我之昭昭，给我掰开揉碎，讲得口干舌蔽，我还是云里雾里。幸亏，大殿门口的功德箱，把我们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只见那箱侧面贴着一个广告，上面用歪歪斜斜的毛笔字写着——

在大愿法师的领导下，弘法形势迅猛发展，现有的办公室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经大愿法师的英明决策，拟建一座面积约三至四百平米的办公大楼，耗资约三千至四千万元。


¹ 饶瑞农：《走出恐惧——“九一三”事件40年祭》，载《记忆》75期。

望广大佛子、信众踊跃捐建。功德无量。

我跟四会的朋友说，你说的“不思議境界”，我没明白。不过，我倒知道了有一个“不可思議境界”——这个广告即使不是出自大愿法师之手，也一定经过他过目吧？我看这位高僧大德，改行当四会市的宣传部主任吧。他又闭关修行，又得上师真传，怎么竟能允许“领导下”、“形势迅猛发展”、“英明决策”、“踊跃捐建”这类新华体语言，出现在这里呢？

从四会回到香港，我算了一下，这位大愿法师，76年上小学，83年上中学，89年上湖南财经学院，90年剃度，转入佛学院。他的启蒙教育已经远离政治决定一切的文革，然而，他对政治话语的熟习，已经深入人心。

语言反映社会，上述两例，讲的都是政治语言的泛化，尽管成败各异，但都说明一个问题：政治语言已经全面控制了社会，日常语言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大气不敢出，男女情话更是被革命的铁拳打成了齏粉。这是怎么发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解，你好奇，你想打破沙锅问个究竟，某日，偶然间，你看到了一位三八式老干部的回忆录，你不禁茅塞顿开……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虚构了一个大洋国，说掌管这个国家的“老大哥”指示语言学家创造一种“新话”——成百上千地消灭英语中的词汇，削去语言的血肉筋络，让它只剩下几根干巴巴的骨头，以便人们无法表达与“老大哥”不同的思想感情。四十年前的中国，将大洋国的这一理想以中文的形式落到了实处。

【读书】

读周密的《回望》

——周扬的女儿谈文革中的军管会

启之

偶得周扬之女周密的回忆录《回望》一书（北京时代文化发展公司，2011）不厚，215页。前面有《晚年周扬》作者顾骧写的序，后面有叶斌文写的编后记。全书大体可以分成三大块，一是作者在延安的生活，二是中共建政，作者随父母进北京，上中学、大学，到莫斯科留学。三是文革时期。私心以为，此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她对文革中到七机部搞军管那些军人的讲述，以及对工军宣队的思考。

工军宣队是工农化的极至，工农化是毛文化的特点。文革将这一特点放大、突出，成了制度文化的一部分。其具体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血统论，二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三是工军宣队。此书的贡献在第三个方面——她谈到了至今天少有人言的军宣队（军管）的劣迹。

六七十年代，她所在的研究所约有六百余职工，其中近五百技术人员。六十年代末揪出三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加上“走资派”、“有历史问题”、“五一六分子”、“可教育好的子女”、“知情人”以及这些人的配偶等等，“全所上下至少有一半人背负着或大或小的政治包袱。这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执政时期的成果。”（页 114—115）这些军人，除了整人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周密有如下文字：

1972 年 4 月，七机部下放到军垦农场的人，结束了三年的劳改生活，回到北京。那时候，原单位的“走资派”通过什么“革委会”、“核心组”之类的又慢慢恢复工作了。军管会仍然有，至少每个研究室有一个，但也不太管事了，他们正忙转业和占房子，把自己的家属的户口从农村往北京转。据说中央当时批给七机部 500 名进京户口，本来是解决本部人员中两地分居的，可几乎全让军管们自己用了。后来军管从七机部撤出，他们的房子和家属可没撤，他们回原单位转业，退休后，不少又回到北京。我们所就有个军管又回来了，所里拆旧盖新，调整房屋，不得不给他分了一套他满意的。现在老两口在菜市场摆个小摊，据说买卖还算公道，不缺斤少两。

我和本单位军管从没有直接接触过，只知道我们室的指导员姓邹，就是刚从军管转业来的。调来半个月就肝硬化住院了，不过他还是来得及把妻儿办来，在北京还找了份工作。在 12 所住宅区占有一套房子。不久他本人就去世了，听说这个人还行，不太整人，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军管会逼得好多知识分子自杀，军管的人也自杀。周密书中就写到了这么一位。他是七机部二院二部的军管，1972 年喝敌敌畏自杀。周密的前夫，叶挺的儿子叶华明是二部的主任，闻讯赶去。这个军管“尚未死，痛苦得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一身屎尿。叶等人找了辆三轮板车把他拉到 721 医院急诊室。“途中从家属和知情者口中得知，他是因为强暴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老婆从乡下来后发现，大闹，女儿也恨他，愧疚而自杀。”此人没有抢救过来，死了，护士听说了原委，都不肯抬尸体到太平间。（页 115）

周密对工军宣队有很清醒且深刻的分析。“他们本质上都是农民，文化也不太高，

一旦放在了对知识分子‘专政’的领导地位，工作能力、个人素质都跟不上，也就跟李自成、刘宗敏进了北京差不多。……当他们处在贫困的被统治地位时，他们的勤劳勇敢、纯朴善良确有可学之处，一旦地位变化，人性中自私、愚昧、贪婪、狭隘，都暴露出来，一点也不比别的阶级更少。看吧，来十二所‘掺沙子的北汽的工宣队，蹦得最高的那几粒‘沙子’都颇似武侠小说中那些流氓无赖，他们干的违法乱纪之事也最多。”“一生蹉跎，我心中已无抽象的阶级、抽象的党，无论人们的理想多么美好，都得通过具体的人性实现完成，所以人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不论什么阶级，什么阶层，什么时代，老百姓中都有好人坏人，领导集团（或统治阶层）中都有忠有奸。”（116页）

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权力对人的腐蚀，是工军宣队做坏事、谋私利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变化的根据是什么？工农化，向工农学习，与工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这一连串的思想理念，是从哪儿来的？它们潜藏着哪些病毒？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欣然接受，甘之如饴？

【怀人】

编者按：1月15日凌晨，白桦先生在上海逝世。白桦是作家、编剧，诗人。人们知道《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作品出自他的笔下。知道他因一部《苦恋》而罹祸。但是，他花了十年功夫写的长诗《从秋谨到林昭》，以及八旬之年写的《八十年一梦》一文，却罕为人所知。而本文对三者都作了简练的分析。

他在凌晨离去，留给世界一道光亮

——纪念白桦先生

何與懷



我在1995年曾经和白桦先生相处过好些天。那年新加坡作家节，白桦先生应邀来访（一起来的还有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当时我在新加坡工作，熟识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王润华教授，他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担任作家节主办者，便请我这个朋友帮忙接待，每天陪白桦到各处参加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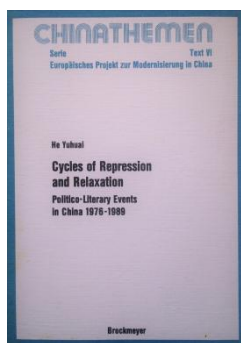
一



白桦在多次演讲中说 he 是一只“不合时宜”的公鸡”，别的公鸡大概到了五点钟开始啼叫，他可能三、四点钟就已经叫了，打扰了主人的春梦，使他们很不高兴。白桦在演讲中还形容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就像“剁肉”。每次当权者都会选择好要被剁的肉，同时又布置好一批剁肉刀。他常常成了被剁的肉，这当然很痛苦，但他还是非常庆幸地表示，自己从来不曾当过剁肉刀，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白桦的演（本文作者和白桦先生，1995）说很动情，我不知道新加坡那些年轻的听众是否完全明白，但对我这个经历过毛时代尤其文革的人，听来真是感触万分，而且今天回想起来更甚。看看这位著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的一生，如人们所说，他真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界的焦点的一个代表，是世事沧桑中“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作家的孤独代表。他是“新中国”五十年历次政治运动的“全陪”，从胡风冤案、反右、文革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六四风波……等，一次也未漏网，是全程受难者。这位唯美、唯艺术、唯爱的文学家，却很不幸，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灾难中饱受煎熬，承受着人们无法想象的重负。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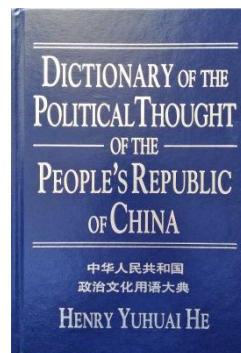
其中，直接以白桦为唯一靶子又堪称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对他的《苦恋》的批判。1982年我离开中国到新西兰读博士，在这之前一年，就碰上这个大批判——我称



之为“白桦事件”，后来在我的博士论文第五章中作了论述（论文出版时的书名为 *Cycles of Repression and Relaxation—Politico-Literary Events in China 1976-1989*，即《紧缩与放松的循环：1976至198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政治事件研究》），在我出版的英文词典中也有相关条目（书名为 *Dictionary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文化用语大典》）。

白桦的《苦恋》剧本发表在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杂志第3期上，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导演是长春电影制



片厂的彭宁，在1980年底完成。剧本写了归国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如同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浩劫使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堕入谷底。在他生日那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此后，他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水中鱼虾及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却燃尽（《太阳与人》的海报）了，虽然在这之前“四人帮”已经倒台。

《苦恋》不但描写了文革的苦难，更严肃地指出了苦难的根源——毛泽东个人崇拜。有这么一个场面：小晨光在庙宇里看到一座金身佛爷的脸是黑的，便问老和尚：“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老和尚回答：“是善男信女的香火把它熏黑的……”这个影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人们不但联想到毛的罪恶，也联想到众多善男信女也许包括自己把佛爷熏黑的“香火”。

这个悲剧还有一个焦点：凌晨光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

结尾写了临终前凌晨光在雪地里爬行，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这和剧本开头引用屈原《天问》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话，相互呼应。在拍摄中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派人到现场传达指令：你们这个戏，别的地方暂时我不管，结尾那个大问号不能拍。因此，在送审的版本里，问号变成了一串省略号。不料这又成为新的罪状——“这部电影很恶毒，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

当局在全国发起了对《苦恋》的大批判，批判白桦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夏天，邓小平召集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非常严厉地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



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三

浑身伤痕的白桦，在他晚年的时候，还做了一件让中国许多诗人深感汗颜的事——从1997年7月15日到2007年7月15日，他以整整十年时间完成了265行长诗：《从秋瑾到林昭》。

秋瑾何许人也？这位辛亥女杰，于1907年7月15日凌晨，因组织光复军起义事泄，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年仅三十二岁。林昭何许人也？她被人称之为“中国圣女”，于1968年4月29日，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被绑赴上海龙华机场执行枪决，终年三十六岁。这两位女杰，虽然时空相隔，却仿佛死于同一个刑场，同一个刽子手。秋瑾死后一个甲子，她在西湖西泠桥附近的坟墓，因经常到西湖游乐居住的毛泽东埋怨自己要“和坟墓为邻”一句话，竟被炸毁了。林昭在苏州有一个衣冠冢，但当局如大敌般防范，不许人们祭拜。林昭在今天的中国政治语境里，是一个禁忌。

这两位女性都是为了中华民族而死的，获得了白桦极高的尊重与敬仰。清代诗人、诗评家袁枚说过：“人必有芳菲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白桦说，他创作《从秋瑾到林昭》这首长诗，初衷是感动，然后是构思，最后是思考。这十年的情感常常让他不能自己，经过十年的孕育与洗礼，长诗终于棱角丰满地横空出世。从诗中可以看出，其实白桦表达的，是一种很基本的要求，他守望的只是剩下的一条底线，可是，这条底线在世界有些地方仍然高不可攀。诗的最后一节喊出：

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

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

还中国以真实！！

还林昭以美丽！！！

白桦在获奖演说中，用了五个“鲜血醒目”的句子，几度泣不成声……

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提醒我们记住她们美丽的面庞！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在二十世纪的史册上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来路和归途！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记住她们的潇洒身影！她们用鲜血的醒目色彩让我们预见她们必将复活的日子！

中国重要的诗评家都说，白桦的政治抒情长诗《从秋瑾到林昭》，是当代中国诗坛上出现的一首闪耀着炫目的思想光辉和艺术特色的难得的杰作，它以震撼灵魂的大气魄，为世人呈现秋瑾与林昭的“鲜血的醒目色彩”。此诗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它抵达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将在中国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四

白桦在他八十岁那一年，曾写了《八十年一梦》一文，回顾他的一生，并讨论了一个对他也对中国文化人很重要的问题。

文章开头，白桦就说，他和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来自传统的先天缺陷，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命题，需要在观念和实践上有一个清晰的解答，那就是“爱国与忠君”。

白桦谈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那部电影剧本《苦恋》。剧本里，他只不过提出了一个天真烂漫的问题：“您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您吗？”不料就引来了大批判。批判者气势汹汹写文章的时候，还要弄了一个小小的“技巧”，把白桦写的“国家”改成“祖国”。这句台词传到邓小平那里，便变成了“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其实，“祖国”者，祖邦之国，不以阶级和政治的不同而改变其本邦名分；“国家”者，政治帮派的控制机器，一时一地而非永恒。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都是截然不同的概念。至于政党，更不能等同整个“国家”，代表“祖国”！

关于“爱国与忠君”这个命题，白桦不无痛心地说，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确实是“一日不可无君”，就像毛驴的脊背上失去沉重的粪筐一样，时刻都不得安宁。中国的智慧有意无意都在为帝王献策，甚至很少考虑自己对自己有什么期待，甚至连自己的存在都忘得干干净净。白桦提到中国近代史可耻的一章：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拱手把大权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仍嫌不够，经过三年筹划，居然在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五年即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虽然很快遭到共和人士的激烈反对而颓败，但是，许多中国人心中的九龙宝座，并未从此崩塌。

白桦说得太对了。他回想年幼时每当看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史料，总觉得实在滑稽可笑，可是后来他就笑不出来了。历史的诡谲在于，有时竟然会出现令人口呆目瞪的重演。白桦年幼时觉得滑稽可笑之事，在文革时期出现了——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这个“伟大领袖”被全党全军全国亿万民众拥送上高高的神坛上。而文革之后五十年，竟然又有人取消宪法规定的任期制，梦想再作毛泽东。

今天，《从秋谨到林昭》不为当权者待见，《苦恋》这部一开始就被尘封的影片看来更难以重见天日，但是，白桦这两部作品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非凡的意义。


人们惊奇地发现，《苦恋》具有极其准确因而极其珍贵的预言性——

剧本在结尾，写了凌晨光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这个“？”问号的悲壮感太震撼了，这就是“天问”，这个“天问”直到今天还属无解。在送审的电影版本里，问号不让表现，于是这样处理：一切安静下来，一个太阳，一枝

风中芦苇在日轮里飘摇，然后画外配以定音鼓，一声强击，一个点出现，连续六声强击，省略号六个点出现在银幕上。这也是甚具力量的神来之笔——确实是“对着红太阳打了六炮”。最令人钦佩的是，白桦把凌晨光的死亡安排在所谓“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电影剧本中，飞翔的雁群在天空写成大大的“人”字，从开头贯穿到凌晨光的死去，最后，只见“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含蓄的寓意，更加深了对凌晨光的死的渲染。当年，重新上台的当权者把文革的一切灾害苦难都说成是“四人帮”以及“林彪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他们的覆灭，文革的结束，就好像从此万事大吉。这几十年中国发生的事，证明这是弥天大谎，凌晨光们的悲剧，还在不断发生。

而《从秋谨到林昭》，此诗的最后一节喊出：“把黑色的白还原为黑！把白色的黑还原为白！还中国以真实！！还林昭以美丽！”这俨然时代的最强烈的呼喊。如何实现？白桦在《八十年一梦》说了：其实，一百年前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走向共和”。

五

白桦，这只“不合时宜的公鸡”在今日凌晨辞世，就像《苦恋》中的凌晨光一样，留给世界的是，黑夜将尽时最早出现的一道光，这光将激励人们思索中国的未来。

（2019年1月20日于悉尼）

【怀人】

那颗曾经划破夜幕的陨星

——纪念文革中惨遭杀害的思想者遇罗克

何與懷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发表了王晨、张天来写的长达两万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该文以这样诗情澎湃的议论来展开震撼心灵的叙述：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

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的智慧之星。流水行云，真是弹指一挥间！1980年，至今竟已过了二十六年！该文两位作者，不知近况如何？不知是否还记得他们当年激情？至于一些传媒近年来的状况，相信海内外的读者都心里有数……且不管这些，且让我们刻下的心思，只集中在遇罗克一个人身上。1979年，〈划破夜幕的陨星〉发表一年之前，遇罗克案件刚透露出来，尚未正式平反，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很多人都在读他的文章，传抄他的日记和诗作，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当时，面对被惨遭杀害的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全国亿万民众曾经何等悲愤！曾经何等痛惜！曾经何等深思！如今呢？据说时代不同了，遇罗克这种人物已成为历史，并大可以在历史中湮灭……

遇罗克，你难道就这样命中注定，就这样无可奈何，只不过是一颗过早陨落、只不过一闪即灭的流星吗？！

遇罗克 1970 年 3 月 5 日遇难，年纪轻轻只有二十七岁！

让我们打开记忆的闸门，暂且回到那些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年月吧。

一

1966 年“红八月”，北京掀起一场惨无人道的“红色恐怖”的狂风恶浪，几个星期之内，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超过三万三千户被抄家，超过一千七百人被活活打死。这就是那帮最早“造反”的“老”红卫兵的“得意杰作”！他们后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以便他们的恶行更为组织化。

而这“英雄业绩”得以成就的指导思想就是他们视为通灵宝玉的“血统论”。

当时有一个“红对联”事件。那年 7 月 29 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基于封建“血统论”——即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红对联”一出台，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议论。8 月 2 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接见“红对联”辩论双方代表时说，对联“不全面”，建议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8 月 6 日，江青、康生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时，江青一再重复这条新改对联。听了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那些貌似公允实质却是煽动阶级对立阶级仇恨阶级斗争的讲话，本来就承袭有封建“血统论”

思想观念的学生更自以为在理。更多血统论对联纷纷出笼，例如：“父母革命儿接班——当然；父母反动儿背叛——很难。横批：理应如此”；“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这些“自来红”们，迅速以出身为标准，自为“红五类”——即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者，并把其它人视为“黑五类”——即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者（后来又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了“黑九类”）。在清华、北大、北师大等校及其附属中学以及其它学校，掀起了成立“贫协”的风潮。8月12日，“红对联”的坚决支持者、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他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建议，提出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要写进中共党章和法律，当作“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以后，他又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宣扬“血统论”和“红对联”。谭的讲话被翻印了数百万份，几乎传遍全国，流毒深广，成为流行的“行话”。自认出身“高贵血统”的青少年争先恐后地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扎上武装带，更加不可一世地起来“造反”。于是北京掀起“红色恐怖”，而且很快“红色恐怖”就在全中国风行。淫威之下，以出身定一切的风气竟然成为全国民众都得遵守的惯例：升学、招工、提干、参军，甚至去医院、乘车船、进商店、住旅馆，都必须报出身，看出身。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在“血统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

就在“血统论”气焰嚣张的时候，1966年10月，北京城市各大路口、各大机关、剧院及各大院校门口，极其震撼地突然出现了数百份题为〈出身论〉、署名为“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油印文章。当时才二十三岁的遇罗克就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的作者。

“血统论”一向是门阀权贵维护特权的有力工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面向苍天的呐喊，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志士仁人。现在，一位叫“遇罗克”的，响应了。这位年青的平民思想家在文革前就曾挺身而出写过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文章批驳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全国敢这样做的寥寥无几中的一个。现在，他又挺身而出了。他断然指出：“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他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出身问题”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描述了一个简单而残酷的状况，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里，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几乎

成了决定一个人未来的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因素。“出身压死人”——一个人如果出身或成分有“问题”，便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迫害的阴影之下，遇罗克尖锐地质问：“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1967年1月18日，打着“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旗号（希望这能对打砸抢的“联动”分子起一定的震慑作用）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引人注目发表了遇罗克这篇〈出身论〉。在以后几期的《中学文革报》上，遇罗克还发表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等文章，对“血统论”继续作出一针见血的系统的批判。由于他笔锋犀利，有理有据，反对派无可奈何，只能有气无力地诡辩和谩骂。因发表惊世骇俗的〈出身论〉而“一炮打响”的《中学文革报》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排起长队购买这份小报，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中学文革报》先后印了近十万份，都被一抢而空。当时，这张小报二分钱一份，但在黑市上卖到两三元，或者要用好多份其它小报才能换到。为《中学文革报》所设的接待站也异常繁忙，以应对读者的来访。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伙伴们深受鼓舞，他们真诚希望中央领导人能够读到这篇文章，并且支持他们。

二

可是，等待他们的是厄运。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这样，〈出身论〉立时便被置于死地。面对随时会来的危险，遇罗克毫无惧色。他坦然地对伙伴们说：“把一切都放在我身上好了，你们不必去承担什么，因为那样也不会减轻我的罪名，反而只能给你们自己找麻烦。”他照常写作、生活，相信人们终究会对〈出身论〉作出公正的评价。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大声地质问：“我犯了什么罪？”回答很干脆：“出身就是你的罪！我们拥护‘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狱中，遇罗克受尽了那个时代所司空见惯的摧残和虐待。有时他每天都押到各处受批判，每次带出去就像扔木头一样扔上汽车，被士兵踩在脚下，用刺刀扎住后背，脖子上还要戴一个钢制器械，如果在现场喊叫，只消在后面一勒，即可休克。批斗时一名警察踩住脚镣，两名警察把住胳膊，惟恐挣扎。脚镣粗糙不平，铁圈上的毛刺把脚脖子刮得鲜血淋淋。遇罗克回到牢房偷偷用布缠上，而每次看守见到就要扯下！

遇罗克一直坚强不屈。曾经与他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郎郎，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后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张郎郎，〈我和遇罗克在狱中〉）

在张郎郎的眼中，遇罗克很有智慧，甚至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和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但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陷害别人，更不会在当局谎言的“感招”之下，见利忘义、落井下石。

文革研究者发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遇罗克在自己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清醒的人道理性。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

遇罗克对张郎郎说出他心里的想法：

你不可能理解我们的心情。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一直没有和你们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和生活权利。所以，即使在我们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出现先天性的自卑感——一种政治上的软骨病。因此，我们这些人很难勇敢地团结起来奋勇前进，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去争取自身应有的权利。这次，〈出身论〉的发表，也许是我们这类青年所能发出的最强音了。它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些。我很有满足感，我愿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张郎郎，同上）

遇罗克付出代价的时刻到了。那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之前，遇罗克曾经让家里人买一件新背心，但等到母亲好不容易把新背心送到监狱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被判处死刑了。他想，既然这样，就没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还是留给弟弟们穿吧。那天，他就是穿着一身破旧不堪的衣裳走上了刑场……

1964年初，遇罗克曾作过两首诗词。题为《游仙 咏香山鬼见愁》的一首云：

巨石抖，欲把乾坤搂，千古奇峰人共有，豪杰甚或阿斗。

山上绿紫橙黄，山下渺渺茫茫，来路崎岖征路长，那堪回首眺望。

另一首为《无题》：

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这是他那时的心境和抱负。他准确地预测出“来路崎岖”而且“路亦迢迢夜亦长”；但这是一条“征路”，他“欲把乾坤搂”。而现在，一切都作了一个了结——他已经走完他的路了。

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一篇文章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难以重判，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在北京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一共24卷，这就是遇罗克的全部“罪证”。

三

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同时又是在毛泽东的绝对神权威慑着几亿中国生灵之时，中国人发出的第一篇革命檄文。遇罗克不同凡响之处是看到了“血统论”背后的“阶级论”。毛泽东的所谓“阶级路线”，如果说在战争年代是团结队伍、夺取政权的有力保证；在掌握了政权的和平年代里，就成了统治集团用来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后代去“名正言顺”地垄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资源的“封建”手段了。在《出身论》中，遇罗克以种种论据一层层剥开“血统论”的反动和荒谬的实质。当然，如论者所说，在当时政治环境里，他只能把话说到“不好”的出身并不比“好”的出身更能使人变坏，却不能说这种出身带来的压迫和侮辱反而使人更可能作为叛逆。他甚至还必须用毛泽东本人的论点去批判毛

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造成的“血统论”。据张郎郎回忆，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他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他这些理论。但是遇罗克实际上却又比单单批判毛泽东走得更远。他严正地宣布：“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发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他写道：“有理由这样讲，如果不把以前受压迫最深的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彻底解放出来，那么，这次运动就决不会取得彻底胜利！”由谁来解放呢？遇罗克明确指出：被压迫者必须自己“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胆小鬼才等待别人的恩赐，而革命从来依靠的就是斗争！”

遇罗克，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是一个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当年也为“老红卫兵”一员的张承志（“红卫兵”是他起的名字，最早用作他及同伙写大字报的笔名），在《高贵的精神》一文中万分感慨地说：

遇罗克启发的是平民的尊严，是可能潜伏底层的高贵。同样，对遇罗克的忏悔，也决非干净的回想录，而是接续他与特权主义的对峙。我们对过去（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一环而已）的最彻底反省，就是对歧视人权的血统论永不媾和的宣战。

当年，还是非常青年的诗人北岛，目睹了那场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高呼“打倒”声中的最后审判，以极其悲愤的心情，罕见地写了两首诗献给遇罗克。

那首题为《结局或开始》的诗中写道：

.....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在《宣告》一诗中，北岛以遇罗克的口吻，向世界严正地宣告：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文前有这么一段话：

四十年前，毛泽东及其同伙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浩劫中，两千万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一亿人遭受政治迫害，整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高达八千亿人民币。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就连人类公认的准则、道德、文明、人性，也被摧毁被扭曲了——这又是无法计算的、长远的、深层的对中华民族的创伤。这十年所发生的种种，还历历在目，如同昨夜的恶梦一般，无不在一个个如我一样的文革经历者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颤栗与伤痛。

此时此刻，我特别敬祭那些在文革中（也有在文革之后）惨遭杀害的思想者。有名的，无名的，他们珍贵的思想犹如沉沉黑夜里一星半点火种，来不及发光发亮，就被凶恶的政治势力以极端残酷的方式扑灭了。他们以宝贵的生命作为代价，见证了文革的罪恶，专制制度的罪恶。

【述 往】

独自生存之三：一九七六！一九七六！

贺美湘

一 换个环境

说起来也是很奇怪的事，我说不准搬到妹妹工厂去的具体日期，按推算应该是七五年的初春，但我却拿不准；也讲不清我是如何去的，坐货运卡车这一点可以确定，因为只有这个可坐，却讲不清我是坐在驾驶室，还是坐在车厢内我那把老式的笨重的轮椅上，轮椅是七一年刚上任堂姐夫不久的Y老兄带我和妹妹通过战友关系，论斤从荣军学校买来的二手货，带手摇柄的三轮轮椅，80斤80元，当时荣军学校的办事的还一再劝我先住那儿几天，试妥了再拿定主意，以免到时不合适退货麻烦。因为我无法直坐，只能躺坐，勉强直坐用手摇轮椅，道路稍有点点坡度就会上不去。我坚持买下来，手柄和前轮多余而且碍事，请在工厂的同学锯去手摇轮柄及前轮，前面换上两个小万向轮，变成怪模怪样的四轮轮椅了。世界的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我弃之如敝履者也许彼视之如宝物，当年由别人推着我与我的怪模怪样的改装轮车上街时，偶有人会追着问我们锯去的那截前轮还在吗，大有可以买得好价钱的可能。

我就这样离开我的父亲，心里有一种没有归路的凄凉。其实我和父亲并无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如果我不想东想西，大可以相安无事老此终生。虽然他希望国家或什么组织给我一笔固定的生活津贴，可以吃着这一口饭渐渐老去；虽然他希望国家或什么组织

把我收去，同样地吃着别人做的一口饭渐渐老去，但如果这两者都不靠，由他的饭碗里均那么一口饭让我吃着渐渐老去，他并非不肯，虽然他由此觉得世道不公，那并不是冲我来的，我吃他这口饭很是安分守己，从不挑三拣四。我们几乎没有争吵也没有讨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互不相扰地生活。一年里总有那么三四回，他会忽然对我的客人以他特有的方式发火，发泄他的委屈和对我仍然谈论政治、讨论文学并乐此不疲的鄙视。有口饭给你吃，为什么不吃得安分一点呢？从他的角度讲，他的不满和不解都是有道理的。我其实对于生活也并无多大追求，我的能力和现实的条件也不允许我有什么过分的奢望，只是活得这么辛苦，这份辛苦应该“值”，我真害怕我自己，被生存的固有的适应力形成的惯性驱使着，那么地一口饭一口饭地吃着，有朝一日定神回眸，自己已然变成神肖的另一个他，守着一口饭吃下去，一直吃到老死。

我想要找一份我能做的职业，可是一开始就定错了方向，即使我有文学上的才能，那个时代也不会认可我的文学倾向，我的文学倾向也不会认可那个时代。我们如此地互不相容，我何必枉费心力？而且我还要问自己：你真有从事文学的才能？文学叫我如此恋恋不舍，我想如果我能自己挣口饭吃，饭吃得不亏心，做个文学的看客，看它以“高大全”为审美宗旨居然可以生存发展，也还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应该重新拣起我的外语，最开始被否定的科技英语也许是我能拿到的饭碗，但是心理上沉积的疲惫渐渐弥漫成消沉的惰性，人像服了蛊药似的不能动弹，我不知道如何将自己重新发动。

妹妹所在的工厂是个大型的上千人的国有机床制造厂，位于省城南郊，离我家的居民点相距怕有20公里以上。原属政法系统，是服刑犯人接受劳动改造的地方。文革初被收归省一轻（？）局，工厂的性质虽然已经改变了，工厂的原有的风貌依稀可见，围墙又厚又高，各种通道极顾及视野的开阔度，总是一目了然，给人一种无处逃匿的压迫感。部分高墙上还残留着电网。其时妹妹已三年学徒出师晋升二级车工，带了一趟徒弟，师徒似乎不怎么对得上眼，又改做刨工，后来工厂子弟小学需要老师，妹妹对三班倒已不胜其烦，改做了小学老师，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厂里破例在一长溜仓库改造的宿舍的东端给老妹分配了住房，靠近她上班的子弟小学，踩着上课铃声从家里出发到铃落时可以到达办公室或教室。仓库从中劈开留出走廊，虽然库顶有两排亮瓦采光，走廊和套间的小房间仍略显光线不足。我住的是前面的大间，大间朝北，隔着几米宽的水泥路，是工厂特有的高墙，夜里墙那边车间里浇铸铁水的红光时时将夜空燃亮，那是离我如此之近又如此之遥不可及的另一种人生。妹妹和她原车间的一个女工，我们叫她“长子”的同住小间。长子比我大两三岁，技校毕业，她结婚不到一年，孩子刚满月，家里忽然来

了一群公安，把她老公带走了。家也水洗般被抄了一遍。说她老公是工厂盗窃集团的头，盗窃工厂的铜，他老公分得赃款 3000 元，由此判刑 15 年。长子出身不好，原想找个根正苗红能干可靠的男人嫁了，把自己和工资都托管给丈夫，不料晴天霹雳，万事成空。休完产假上班，流言几乎将人压死。形单影只的，遇上生动玩闹、口齿伶俐粗线条的老妹，很是相投，说起半夜心悸有人窥探的事，老妹很是爽快，便搬到她的宿舍和她做伴，待到我搬来，她也带着她的锅碗瓢盆转移阵地和我们同住，一来可以帮帮老妹，二来她也实在孤单。这样，用我的 500 元的残余部分增添些必需的家具，三个女人组成的家就步入正轨了。有人说你们这儿结婚新房似的，不是讲房间的奢华，而是讲它的清洁（墙壁真是洁白）和空荡。其实简朴里真有一种不经意的淡定的美。

首先是生活费的约定，我提议每人每月 13 元共 39 元，多不退，少不补。我的生活费父亲每月负担 10 元，其余不足由妹妹补足。妹妹每月 38 元的工资，长子因工龄缘故工资高一些，她对我说的生活标准很是认同，因她每月要交 20 元给她妈妈，负担她的孩子。手头实在紧。39 元的生活费，三人居然过得有模有样。买菜做饭自然是谁方便谁做，长子三班倒，妹妹上班地点近，时间都有活络余地。我很踊跃提议让我煮饭，虽然我煮不煮饭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但提前把蜂窝煤炉门打开还是有点用的。所以她们上班时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把蜂窝煤炉提到我的床边。长子总是在意地做好这些事，妹妹总是杂七夹八丢三拉四，我一抱怨，妹妹就回应我，说我添乱。长子是我们姊妹冲突的天然缓冲区。周末的时候，工厂放放《海霞》之类的电影，我们也去看看。生活似乎变得流畅起来，做做饭，打打牌，三人高兴的时候开开玩笑，甚至还帮妹妹改改学生作业本，给跟不上趟的学生补补课。因为住到郊区，兼之同龄人纷纷结婚，有了小家庭，朋友来往渐少，但偶有一次聚合，包包饺子聊聊天，似乎真是快乐。另一个我静静地看着这一个我，看着快乐流淌后面是生命的流淌。

这样的日子不可能长久，妹妹是要结婚的。我不知道我如何面对他们的两人世界。

二 她想有个家

我搬到妹妹工厂的时候，妹妹在恋爱经历上已经算是饱经风雨，经过起伏跌宕，不是山不就水、就是水不就山的多番转战，在浪费了许多热情和幻想，多次无功而返的相亲面谈之后，开始从高亢的“白马王子之歌”转入低调的“我想有个家”的咏叹。我的富于理性的朋友曾说她“可塑性很强”，可是有白马王子气质外形的雕刻家到哪里去找？她的性格如此刁蛮难驯，如果我是有白马王子气质的雕刻家对她的放电我也是要逃之夭夭的，天涯何处无芳草？“塑造人”这样伤筋动骨的艰难的工程，只有自不量力的

经历尚浅的人才会贸然认领。但是经历浅的人难入她老人家的法眼，何况“敢认领”和“雕塑之才”之间关联性实在令人置疑。可塑性又有被塑和自塑之分。阿凡提的驴子很有记性，会主动避免第二次陷入桥上的塌洞里，我对我亲爱的老妹的记性的可靠性十分怀疑，她很可能二次三次地一再跌入此洞（呵呵，我一定在决定把这段讲她不如阿凡提的驴子的文字给她看见之前提前准备好钢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得有一次我请她帮我把我床上挂的蚊帐整理一下，她随口问道，“这帐子谁给你挂的？”我答道，“除了你还有谁？”她不记得给我挂过什么蚊帐，照例我们又争起来，她说她从来没挂过，不可能是她，她连我有蚊帐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是她挂的呢？我忽然抓住她的破绽反驳道，我的蚊帐在你的鼻子底下挂了两年，你连我有蚊帐的记忆都没有，你怎么能以你这样的记性为准来说我记错了呢？她一时哑口无言。我不是有急智的人，赢她一回或让她认输一回真是十年难得一遇的。虽然这样的完全获胜记忆至今仍然鲜明并仍引以为喜，显得颇为小气，但写在这里只是想说明雕刻家不是等闲之辈随便就可当的。我自己还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有自知之明地放弃当她的雕刻家的重任了。当时由于她2次方不会，我严斥她上课干什么去了（我知道她画古代仕女去了，她的美女画得真是一流，女朋友们的定单不断，她只得利用上课时间加班加点，很辛苦的），她态度强硬，说你不教就算了，管得着我吗？我一时青筋暴起，给了她一栗子，她立即还我一栗子，于是我们打了一架，她被打哭了。骂道：“不要脸，还是好学生，还是团员，在学校一个样子，在家又一个样子。假样子！还有脸来管我，哼！”骂得我羞愧难言，自知自己姿态实在难看。细细回忆争吵打架的全过程以及以往打架的全过程，都是我当姐的认为她不对而她又不服，而当姐的耐性和智慧都实在有限，一发急就动上手了，她立刻以牙还牙，并且从来不服输也不哭。我不问她的事，也就不会指责她的错误，也就不会有争吵打架了。我那时还想，她干吗不早点又哭又骂呢，骂得我早点如此反省不是可以少打好多架吗？

提起这些琐碎往事，我只是想说明，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自塑愿望似乎不会很强烈，外界的感官刺激接踵而至，大脑总是来不及细细吸收和整理，总是处于被动的反应过程中，我们有时称这种反应方式为“情绪化”，情绪化而不长记性，自塑的效率怎样是可以想像的。那么被塑就更难讲了，一个人愿意被塑，并且被塑得舒服而自愿，实在是一种最高境界，不亚于武侠小说中的顶级武功，不是常人可企望的。如果你自塑和被塑都不靠，而你又想有个家，那么，或许你很走运，碰上脾性相投的人，有商有量地就把该办的事办了，不知不觉就把你的人生走完，并大彻大悟而又意舒难平道，“原

来平平淡淡才是真”；或许你被生活慢慢磨砺，变得不再是你自己，经营出一个摆得上台面的家或者经营终于失败。自她最后的情感经历陡起变故，我终于觉得，各人的命定是各人的命定，旁人真的无能为力。

新的候选人在市里主办的绘画进修培训班，对我妹妹一见钟情，我的那位理性很强的朋友并有意从中做牵线人。他曾问我的标准，我说什么都不在言下，就只要这个人曾跌倒过，又爬起来了的。他颌首很是认同。后来才发现，我们的语境是有差异的，他认为“跌倒”是指经历，我指的“跌倒”是内心世界的坍塌和重建。当我的朋友问我对此人的第一感观时，我只能说，觉得他本质上是个有些文学气质的单纯的人，同时是个善于隐藏自己的人，所以谈不出什么印象。我自己心理疲惫，不想也不必介入其中，妹妹愿意交往就交往好了，随她。我对妹妹的指点是，不要去顾忌别人怎么想，感情上的第一宗旨就是讲真话。你怎么感觉，就怎么讲好了。

妹妹是个跟着感觉走的人，“我想有个家”只是调整自己的择婚标准，并非表示她也相应调整好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她固执得像条牛，套用果戈理的比喻，她有个什么想法，就像用锤子锤入大脑的钉子，拔也拔不出来。正好她做不来淑女，“讲真话”固然很合她的本性，对追求者的承受力真是大的考验，他的感情被一次次撞击，伤害后逃跑，逃跑后又被自己的爱情提回。我和长子冷眼旁观，在他们漫长的马拉松之恋的时空里平静地流淌着我们的有限的快乐。

候选人登堂入室渐渐成为可能，我忧郁地想，他们的婚姻之路的磨合期将更为艰苦漫长，后果难料，有个金钟罩将我罩着，将我的感官完全封闭就好了。我的生活里适时出现了另一个男人。

三 七六盛夏，如火，如冰

我忽然觉得，用“金钟罩”来形容他的外形和性格颇为适宜。略胖而高大，古老的青铜造型透着坚硬和敦厚，只是还是个粗糙的坯模，未经岁月的煅烧磨砺，如果倾听那由一分单纯、一分混沌、一分精明混合而成坚硬的钟体发出的轰鸣，缺乏浑然一体的和谐，却透出不自信的脆弱。用“阳光大男孩”来形容似乎更为直白，但这个名称似乎是专门为那些二十五岁以上仍然坦然地从父母口袋里掏零花钱的人们准备的，与我们这一代人无涉。

我在到工厂之前已经见过他——是那种常有的慕名拜访者中的一员。待我来到工厂，待朋友们散尽，他便很有理由地开始频频在我身边出现。把时间花在我这儿，他愿

意，他觉得值。他是外省人，也像我一样卷入这场无谓的武斗，为远避是非之地作为知青投奔他母亲的农村老家，然后被招到这个工厂。女朋友和发小们都在数千里外，他虽然有妈妈在一起生活，心里却是一份无法排遣的寂寞。有空的时候，他会跑来看有什么事要他帮忙，和我们一起打打扑克也觉得不错，后来觉得打百分不过瘾，几个人玩抢算24分的游戏，四人各出一张牌，谁先把四张牌的点数通过加、减、乘、除算出24点牌就归谁，我们玩得狂热又认真。比谁心算快口快手快。其中似乎手快最为重要。妹妹和长子总是先输，我总是最后输，坚持得越来越久，即使他把赢的牌让出一部分给输的人继续游戏，先输的也觉得没劲了。于是游戏结束，改为聊天。

渐渐地他喜欢单独和我聊。他会惆怅地坐在桌边，谈懵懂的童年，回忆快活的少年，以及文革的种种旧闻和新闻，乡下当知青时的趣事，他的女友和朋友们。我默默倾听，我一向很少说到自己，他并不很在意我的封闭，也许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向一个他愿意倾诉的对象倾诉吧。后来他提议教我围棋，终于不耐围棋盲的浅薄而请我帮他打打棋谱。

我读到了潜在的某些信息。我不讨厌他，我对他不设防，只要我有，我就给他。生存和毁灭，我都不在意。我倒渴望有大的风暴，将这不死不活的我完全地摧毁。但是我没有，我心中宁静如水。我笑他本质上其实是个富农，把他的物质世界打理得精细周全。允许他发家致富的话他会欢天喜地，成果极佳，快速大富大贵。天安门事件时，他激愤万分，对镇压者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我对这些激烈言词不感兴趣，我认为他也很可能是举大棒的工宣队的一员，因为人性是这样的脆弱、盲目、愚昧，更容易被境遇和舆论所左右，干着蠢事却还以为是行正义之师。他以为这是我对他的诋毁，几乎要变色而起……。

这次争论似乎是我们中较成形的一次争论，因为他认为我太看低他了。可是我确实认为人在没有获得完全的自我之前，总是要受舆论和既得利益支配的。因为我在他的身上，不断读到我从前的自卑和懦弱，它们掩藏得很好，但是气候一旦适宜，总是会跑出来作乱的。我很难触动它们，这家伙自我感觉良好，皮实得很，一生恐怕看过的书加起来不到三本，虽然有些耿耿于怀我的关于他可能是工宣队员的妄测，却以“不与妇人一般见识”的宽宏大度放过这场关于人性的不确定性的抽象争论（当然这种话是放在肚子里说的），不愿让这场争论妨碍我们继续打棋谱，更多的独自相处。七六之夏，炎热如火，午后更是闷热如蒸。小小的风扇扰动着热风，汗不出了，只表示热被暂时压抑。当棋盘对面的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时，我的心只是狂跳，继而心乱，将手挣脱，随手将棋子拂了。我诧异自己竟然会心乱，眼泪却泛了出来，我不愿意他看见眼泪，将脸埋起。他

见我没有任何回答，几乎是仓惶逃窜的。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又来了。仔细看我是不是生气。接着谈了他的想法。他喜欢我，但他是要结婚的。他出于同情才允许自己的。我讨厌这份同情，不管是一种单纯还是一种矫饰，以同情的名义表达的总归是对情感的不负责。但是我要把已经开始的事情继续下去。我应道，我认为他应该拥有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他的任何诺言，我只要他的真实。如果他不愿意了，请明确告诉我，我不会纠缠不休。我看见他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我的眼泪又再次泛出。我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中间致命的分歧，这个“同情”完全不是我要的东西。这个“同情”让我在这夏季的炎热里体验到冬天的寒意，“同情”的结局和我要的结局相差万里。“同情”是一份单向的赐予，同时意味着赐予者可以随时收回。我要的是一份双向的情感，我需要通过它和这个世界建立某种联系，在茫茫人海中有人在想念我，呼应我，它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想通过释放全部情感需要的形式作为一个女人而被肯定，维系生活与我的微弱的关系或位置，真的是一个疯子的思维。

长子此时已是满腹心事，对家中的闲事一概不予理睬。她已提出离婚，对方表示同意，但要求把孩子判给他，以便将来刑满出来能留在城市，实际孩子仍归女方。我帮她写了封言词恳切的长信，请对方完全放手。她正忐忑不安等着回信呢。头天有关于她丈夫出事的传闻，并告诉我难怪她出厂门看见三只黑蝴蝶一直在她前面飞舞，心中充满不祥之兆；第二天传闻澄清，又兴高采烈地说碰见另一个有离婚经验的同事，告诉她如果迫不得已如何走法律的途径，并总结道：“我遇难时总会得贵人相助。”不安把她折腾得方寸全失。趁长子不在时，我把这件事告诉妹妹。告诉她我们“好了”。她怔怔地说：“你们真浪漫啊！”我不做声，默认她的说法。随后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毛公过世，无穷无尽的追悼会耗尽了人们的虔诚和耐心。七六的多事之秋，不可一世的“四人帮”居然像纸牌砌的塔一样倒得毫无支撑力。在这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时机，“按既定方针办”叫得真让人绝望，叫人心凉。这些巨变此时离我十分遥远，我从来没有活得这么自由，这么完全地释放自我。我感觉着情感的燃烧和灼痛以及颤栗，我任由它把我带向生存或毁灭，我真的不在意。我知道他不会理解也不会感觉我的生命正向深渊坠落，他做的事如此非出一般，让一个自以为成熟的女人眼泪滂沱，他得意着呢。他坚守他的得意和成就感。虽然他惊诧“你是认真的啊”，感觉到这种“认真”的压力，却会很个性很个性地警告道：“我是个服软不服硬的人啊。”像鸭子抖抖羽毛震落水珠般地将压力和思考抖落。我独自去体验和完成这个生存或毁灭的过程，生命的本质对于每个人也许并不一样，那么对于我，爱的绝望的燃烧如火又如冰，寒冷又

孤独，因为应和永远来得迟慢而犹豫，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差距总是无法消融。

斗转星移，转眼已是冬季，我们的恋情也进入冬季。应和来得更加迟慢和谨慎。翌年1月妹妹临婚，我暂住到长子那里，他犹豫着第一次与我进行了断此情的谈话。我只能说，好的，我遵守我当初的诺言，我不会纠缠不休，可是你确实想好了吗？我后来默默哭了许多，长子问我怎么了，我说鼻子不通，感冒了。后来我真的感冒了，咳得利害。我本想在长子家多寄住一些日子，这对我们三方都好：新婚夫妻多一点自己的空间；长子和我做伴，各自不那么孤单；我仍然不肯放弃幻想，将我的已步入冬季的恋情在最后的时限里向我希望的方向推进。可是要把我接回去这个念头像钉子一样敲入妹妹的大脑，天天劝我回她那里，我们又吵起来。长子不置可否的态度让我待不住，于是一家伙搬回新婚的妹妹家，在长子那里住了不到十天。等搬家的忙乱过去。长子坐着歇气，忽然流泪满面。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她大而明亮的眼中滚落，我第一次看见长子这样哭，以往她说到伤心的事，会顿住，眼圈略红一会儿，再恢复控制。我一直暗服她的不一般的情绪控制力。她的大颗大颗的泪滴将我心中的不满洗去。我问道：“你怎么了？”她哭了好一会，终于轻轻回答：“我忽然心里空落落的。”我们相对无言。我嘱咐她以后仍多来玩啊，她点头，双方都知道我们快乐的日子已经无法回复。

我们的恋情就像两支汇合而成的溪流，我这支仍然澎湃而激烈地流淌，他这支日渐日浅，已几近无声无息，这支爱之冬曲分明只是我的独唱。虽然他收回了了结的话，要我好好等他婚后回来，但我知道，他再也不会回来。果然，等到3月，他终于能够与我谈话时，他表示了坚决了结的态度。他那样一个粗线条的人，是不会明白一个女子独自面对情变的痛苦、无助和脆弱的。我得独自收拾残局。我说我开始学习外语，请他隔段时间来看看我，他答应了。但是那段时期，他再也没有来过。而数年或数十年后他再来时，我微笑着接待他，我想他从我的笑容里看到了一个无人打理的弃园，生命在那里自在自为地生存，与他的探视打理与否已毫无关联。

四 你凭什么活下去

和新婚夫妇住在一起，正是我自我感觉最差的时候：我爱的人，我以为也有点爱我的人离我绝情而去，我得独自承受失败；我恨自己缺乏意志，无法控制自己的思路，总是绕着圈子回到起点。以往我处理麻烦时，已经结论的问题对我就不再是个问题，但是这次不行，我总是无法避免地要回的“他是不是也有点爱我”这个愚蠢的起点上，我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我厌恶单相思的自作多情，我不以为我的情感可以单独存在。而对方的感情状态是无法以推理的形式进行判断的。我只要看一下对方就

可以确定自己感情的正确位置和状态,但这个蠢货却逃之夭夭,以为钟馗要绑他去祭鬼。平心而论。他冒失地做“好事”形成骑虎难下的态势,如今从虎背生猛一跃而下,自以为生还已是奇迹,那有不拔腿狂逃之理。他一向以为“勇敢者”的称号非他莫属,逃起来真不是一般地勇敢。我对自己说,“走开”就是真实,就是态度,就是利害关系,就是情感取向。死了这条心吧,停止想这件事、这个人。但是情感这个东西,如此铭心蚀骨,不肯听从理性的呵斥。“置之死地然后再生”,我已成功地将自己置之死地,我逼迫自己寻找生机。

日子艰难地一天一天挨过去,外语学得停停歇歇,进展艰难,有时候可以全部排空杂念让身心全部进入学习状态,有时又被思绪缠绕得痛不欲生。反反复复的思虑在内心逐渐积压形成极度的紧张,我对妹妹妹夫几乎只有“好”、“可以”、“随便”几个短句的机械回应,几乎完全没有笑容。我与他俩之间的关系也逐步积压出一种紧张,有硝烟将起之势。我从妹妹的语气态度里读到妹夫对我的不满,她几乎直接把妹夫的话全写在脸上了。我自忖自己对他们并无不合理的要求,也未曾不合理地干预过他们的生活,并一如既往地尽可能自理自己的生活。我已封闭我对他们态度的敏感。即使挑衅性地分桌吃饭,我也没有回应。但是我的痛苦无论怎样内敛也要影响到他们的,他们还太年轻,这种贴身自我封闭防卫术,不是一时就学得了的。妹夫开始质问我的不快乐,我在此刻实在笑不起来,我没有快乐去犒劳他们,实在我也顾不得他们了。

妹妹问我可否给她的一个学生补补算术,已进入四年级,这小子什么也不会。于是每晚在寂静幽深的走廊里响起我们的对话,孩子的语声十分地稚嫩而我的语声相应十分苍老。我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和教学同步进行“通分约分”的辅导。我和孩子约好,一个月后单元考试,他过了80分我们继续。不过80分证明我们在浪费时间,就算了。小男孩一天到晚忙不赢,有许多的事都耽搁着,到菜地里拔莴苣或到鱼塘里钓鲫鱼,废弃的仓库里又发现新的鸟窝……他恨不得立刻宣布课外辅导是浪费时间。但是家长的严厉督促和老师的威风,不是他能抵抗的。于是不情不愿地来受我的斥训,所谓辅导就是把他白天上课忙着干别的营生全然不曾入耳的内容再重复一次,然后在耳提面命的督促下练习一通。我们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一对一也没余地开思想小差分散注意力。这么一点一点灌入通分约分的方法,他却在考试时仍只拿回70分。半个小时他就做完了,迫不及待地交卷,然后得意洋洋在窗外嘲弄那些不会做的挖耳挠腮的玩伴,激动得几乎要冲进教室帮他们完成。算术老师只好把他赶开。这小子如此快乐轻飘,写答题时抄错了计算竖式的得数。我现在仍记得我说不再教他时他的眼神,有几分惊愕也有几分自尊,

然后说，“我才不稀罕，读书有什么好，你不是也读了一肚子的书吗？！”妹妹很有些惋惜，毕竟这是孩子最好的一次考试成绩。我不做声，我自己尚不能自保，凭什么逼迫一个孩子做他不情愿的事情？如果他愿意学，他已经知道如何去学，如果他不愿意去学，没有人能陪伴他终生。如果他选择放弃，他不会将所有的有关他的生活放弃，他只是放弃他不感兴趣的部分而选择他感兴趣的内容。我们成人未必能保证我们自身的选择或放弃正确，那有资格去指导孩子。

我的学习又进入停顿。这次妹夫直接问我为什么金钟罩“很久不见了。”我说他说过来看我，但是失约了。他立刻接茬试探问要不要他和他谈谈，我顾不得自己的要命的自尊，问怎么谈，他说，要他来啊，我问：“他不肯来呢？”“我拖也把他拖来，我不能替他背黑锅！”我的妹夫慷慨激昂。妹夫因为我肯和他谈这个问题而兴奋起来。我想像着一个自以为是的横蛮的家伙和另一个自以为是的横蛮的家伙的口舌之争、责任之争，心里充满厌恶。厌恶自己屈就这样的理由这样的途径。而且，各人头上一片天，我与第三方关系的处理的不能取代我与第二方关系的处理，在我努力使自己适应与新婚夫妇共处时他们也要学习和一个不快乐的残疾人共处的技巧。我立即要求他不要介入，不要找任何人谈。这个要求似乎把我短暂的信任或授权收回，我们略有好转的关系立刻又进入紧张状态。

在做最后的决定前，我像以往一样，把所有的可能的出路都走一遍。我接着约了一个朋友来聊聊，这是妹妹结婚后我第一次约朋友来谈谈。其时国策是执行“两个凡是”，执行的是没有“四人帮”的肯定文革的“四人帮”治国大略，一个新的个人突出的核心集团似乎已经形成，“四人帮”倒台后部分文学期刊已复刊，我的这个朋友已有小文章刊载于上。问问他的文学取向，仍然的上了再说，摸石头过河。我们谈得晚一点，晚上十点了。因为妹夫这周上晚班，他的工厂很远，十点他得出发。而且我很久没有和人谈天了，所以没有把半途的谈话停下来。妹夫没有按时出发上班，却忽然直接给我的朋友下逐客令。朋友一听，立刻道歉走了。我大怒起来，立刻和妹夫凶狠地大吵一番。这是我为自己和他唯一的一次剧烈的争吵。

我质问他凭什么对我的朋友这样无礼，他回答说我的朋友剧晚滞留，妨碍他人生活，无礼在先；我质问我以前这样做过吗？我的朋友可以坐到什么时候，你给我预先打过招呼、有过约定吗？他说他不是我的仆人，我说我不是他的食客；他说这是他的家，他有权按自己的需要安排他想要的生活，我说房子是厂里因我要来才给妹妹安排的（这有点强词夺理）。我也有自己的权益，应该互相尊重；他质问我一天到晚扳着臭脸对他们

究竟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只是不习惯和他们相处，他回答说他也不习惯和我相处，我答道我不习惯我努力使自己习惯，你不习惯也应努力使自己习惯，我们各自守着自己的领域相安无事，凭什么你一再挑拨我与妹妹的关系？这样的挑拨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争吵不是面对面进行的，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隔墙你来我去，唇枪舌剑战斗颇酣。妹妹一言不发，似乎作壁上观。后来她告诉我，妹夫严令她在我与他争吵时插嘴。外面走廊站着许多听壁脚观战的人们。我的妹夫开始含糊地对我进行道德谴责，我很疲倦地对他说：“你不要和我吵，这样吵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的。”他立刻问，为什么没有好处？他有权讲出自己的意见！我回答说，因为我已经不想活了！

我的意思是，我正把自己往死路上逼迫，你也来加力，不是抢黑锅背吗？这只是我自己的战争，没有必要把它变成我与他们的战争。但是他听不懂我的意思。后来这场争吵又演变成他们夫妻间的争吵，妹妹凭直觉理解了我的不想活，妹夫却认为我只是在威胁他。这样下作拙劣的手段他是不买账的！他还指责妹妹学舌，把他们二人世界的私语向我泄露，我的妹夫在抓主要矛盾方面表现得十分地无能。

妹夫虽然后来为这场争吵道歉了。并未改变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的思维。忽然有一天，他说他有个老姑，是个孤老，住在社会福利院，政府负担她的生活费用，一切生活都有人照看，生活十分方便。说得像是人间乐园。问我是否愿意到人间乐园去，愿意的话，他可以去打听一下。我立刻回答，“可以的。”他说那你写个报告，我提笔写了几句话。几天后，他要求我再写一份，我冷冷地说，不是写过了吗？他说他卷烟抽了。我又写了一份，并说明：“最后一份，决不再写。”他诺诺。到民政部门及福利院打听的结果，福利院同意接受，但要求：第一，必须本人自愿（这个没问题，有我报告为证，上门走访我也会配合）；第二，每月他们必须负担26元生活费。第二似乎是难以逾越的阻碍，这笔费用是他们不能承担的。其实由父亲承担一部分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事情还有许多说道和斡旋的余地，他们先就情怯气虚，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我由此了解我的新上任的妹夫，他的敏感度和他的承受力相差太大，办事和责任都没有底线可言，面对压力的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指责他人，他们今后的生活将会有许多的暗礁浅滩。难怪他在我面前总是小心翼翼地掩藏他自己。

此处已不能滞留，福利院本不是我想往的地方，父亲那里我并不想去。在又一次的停顿里，我对自己没有穷尽地在一个感情的怪圈里转悠充满着愤恨和绝望，我只有凭意志才可以中止这种恶性循环的思维，开拓新的出路，活下去，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能左右自己的意志，我愤恨地对自己说，你不是不想活吗？你死得了！你只配死！我开始启动

死亡的实质性过程。我把所有的日记信件全烧了，简单地留下遗书，现在已记不起具体怎么写的了，无非是忘记我，对不起，自己对自己很失望之类。然后将台灯的电线拉出来，绑在两手的指头上，再拉动开关。电流接通的一瞬间，身体几乎被电流击得弹起，人可怕地痉挛，接着无声无息，身体变成导体。我把电线解开，糊涂得很，不明白为什么居然电会击人不死；又再次重来过，结果依旧。我心中沸腾的对自己极端的愤怒终于平息下来。我慢慢对自己说：你有意志啊，你几乎直接用手触摸到了自己的意志。你可以用这样的意志面对死，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意志面对生，你可以用这样的意志重建你的生活。这就是你的资本，人不是个个有这样的资本的。原来你竟不知道你有这样珍贵的资本。你凭这个可以做许多的事情，你就凭这个活下去吧。


这一天应该是国庆或什么节日，离如火如荼的七六盛夏已过去一年有余。妹妹妹夫进城过节去了。他们回来，看见拆坏的台灯，很有些惊诧。我简单说明事情经过。过几天，有工厂的朋友来看我，我问他：“你可以要到卡车吗？”他说：“可以啊。”

我说：“我要回家。请帮我回家。”

后来的生活慢慢地打开，我的生活终于获得支撑。有社会全面放开的原因，有我个人的自信和努力。不管我的故事是否继续写下去，我都要特别地向阅读这些文字的朋友说明，那样极端地逼迫自己是不可取的，应该尽量给自己多的余地和空间。我当时感受的极端的孤单，是由于那个时代以及我个人的特殊的生活状态和我的不健全的思考造成的。因为我对社会政治的极端的短视，错误地以为阶级斗争真要讲一万年。否定人性真的要否定一万年，为一个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集团的利益而实行一万年的高压政策。其实你在感受和思考，说明无数的心灵在同样地感受，无数的大脑在同样地思考，因为人的结构和感受大致是相同的，所以你并不真正地孤单，如果你屏声静气，其实也可以做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因为惊雷就在你的内心震动。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行无论怎样违背历史的进程，都只是暂时的。如果从不如意的社会主流退步抽身，如果从不如意的个人情感挫折退步抽身，你仍然可以感受到生活美好的可留恋的东西。你只要给予自己充裕的疗伤时间就可以了。

我一向怕人说我“意志坚强”，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才叫意志坚强。每当我乞求自己的意志要“坚强”一点的时候，它总是使我大失所望，弃我于狼狈不堪的境地，风度自信全失。我希望别的朋友，不要以我这样极端的方式去求证自己的意志。因为侥幸不是时刻发生的，每个人都会有脆弱的时刻，对自己的脆弱不妨宽容一些，因为它只是你性格的一面，只是你生活的一面，等待有时是很难的事情，但有时等待是必须的，等待你

的低潮过去，等待你的世界慢慢恢复平衡，因为倾斜只是暂时的。我还主张不要让“不想活”这样的念头轻易出口或在心中埋藏，因为说多了，似乎变成你潜在的一个愿望，不去实现它就好像对自己不起似的，说话不算数似的，就好像你说“我想去西藏我想去西藏”，说久了而未实现，不是心里颇为失落吗？这样说似乎有点歪说正评，总之，不要无意中扭曲了自己的愿望和内心。

此时此刻，我在键盘上敲击我的过去，我的内心，把它整理成文字，有人会看，有人会叹息，有人会从中读到自己的心路历程，也有人会笑骂，会弃之如敝履而寻找轻松快乐的话题，但是总会有倾听和共鸣，如果你努力去和人交流，也学会去倾听别人和与人共鸣，即使生命的本质就是孤独，世界于你而言就不是封闭的，只要你肯给自己必要的余地和空间。（完） 

附录：

笑对生活，就能走出人生逆境

记者 颜家文

实习生 易冠华

房内窗明几净，衣着干净清爽，3月9日，网友小玉（化名）来到长沙火车站附近



一民宅中，她是来感谢一位特别的老人。这位长沙老人叫贺美湘，今年63岁，是一名高位截瘫的病人。3个月前，小玉失恋，一度丧失继续生活的勇气，后网上偶遇贺美湘，在老人的细心劝慰下，她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左图：贺美湘 李锋 摄）贺美湘是一个不幸的人，但她也是一个点燃别人信心的人。一个人如果躯体的四分之三失去了知觉，她的人生将会怎样？贺美湘给了我们答案。1967年，17岁的她突遭意外，变成一个高位截瘫的病人，在经历心灵的磨砺后，她决心以笑容迎接命运的挑战。在一张3平方米的床上，46年来她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靠着惊人的毅力，像常人一样出色地工作了43年。工作之余，她自学电脑，在网上像知心姐姐一样为网友排解烦恼，被誉为“长沙张海迪”。被她故事震撼的人说“应该怎样面对生活的困难？她就是身边的榜样！”

63岁的她，有着明亮清纯的笑

刚一进门，记者和小玉就被贺美湘的笑震住了，如此明亮清纯，怎么也难以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在床上躺了46年的高位截瘫病人。

老人住的是一栋老旧的宿舍，房间30余平方米，可是属于她的世界却只有木床上的3平方米。木床挨着走廊窗口摆放，窗外阳光灿烂。瘫痪后，哪怕是出去晒太阳，对她来说都是一种奢望。但房间内收拾得干净整洁，老人躺在床上，一只手支起胳膊，一只手轻松熟练地拿来水果小吃招呼记者。她面容整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记者坐下后，她又取来床头的电热水壶为我们烧水泡茶。

“早起，穿衣、洗漱，做早餐、清洗导尿管，除了中餐请一个保姆帮忙外，其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她自己解决，她还学会了给自己打针，几十年了，生活料理得比许多正常人都好，每个来看她的人，都被她感动得不行。”来看她的老同学林敏说。

17岁时，她遭遇意外陷入困境

1967年，因一次意外，17岁的贺美湘颈椎第四五六节骨折，她被送至医院治疗，在医生确诊后，她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从此以后，她胳膊以下的身体将永远失去知觉。生活一下子陷入困顿。“对正常人非常简单的事情像吃饭、穿衣、洗漱等，对我来说都非常艰难。作为女性，身上被弄脏后又无能为力，那种懊恼你们难以想象。”贺美湘说，母亲在自己年幼时就去世了，父亲患有间歇性精神病，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一切只能靠自己。

“那段时间，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我该如何活。”贺美湘说，后来，同学送来张海迪的书，鼓励她重新振作起来，她于是决定尝试开辟一条生活的新路。她开始学蛋画，历经千辛万苦作了几十幅蛋画，可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买；她又学刺绣，可是没有师傅愿意教她，“哪有躺在床上能绣好东西的！”又是一瓢凉水。她四处写信求工作，但是，一次次都被回绝了。这让她深受打击，为了不拖垮家庭，她一度想到了死。

在3平方米的床上，她出色地工作了43年

有一次，贺美湘准备偷偷自尽，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突然清醒过来，一把把她拉住。看着父亲眼中的泪水，她顿时清醒了，她还要活着！她还有一双手，她要像张海迪一样，身体残疾了，精神上要做到永远站着，要永远活得有尊严。她决定，不管经历多大的坎坷和曲折，都要坚强地活着。

贺美湘决定继续找工作养活自己。终于，在好心人的介绍下，她找到了一份油印工

工作——刻钢板。“当时，刻一张蜡纸3角7分钱，练习了15天后，我通过了考试，我躺在床上，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工作上，很快，我就拿到了近50元的工资，比当时很多工人都高。”

上个世纪80年代，她已经是长沙城里为数不多的最优秀刻版师之一。可是，随着电脑和打印机的出现，她的这一份工作走到了尽头。随后，她在湖南科技出版社得到一份校对工作。不服输的劲头让她再次脱颖而出，很多中英文夹杂的“硬骨头”书稿在她这里被校对得又快又好。这一份工作一直干到前年，她感觉身体再也吃不消，于是就停了下来。在3平方米的床上，她出色地工作了43年。从不放弃，在病痛中创造欢乐，贺美湘成为了生活的强者。


每一天，她将爱和温暖传递

是颗流星，也要把光和热留在人间。

贺美湘自强不息的故事感动了很多，同学、邻居及一些市民常来看她，父亲去世后，许多好心人都给了她帮助。被爱和温暖包围的她决定将爱传递下去。

“那年，我妻子做心脏手术缺钱，贺美湘率先捐了2800元，帮了我大忙。”同学徐天明满怀感激回忆说，“要是没有她的慷慨捐助，我妻子那次的手术当时还不知能不能做成。”

身体虽然不便，心灵可以飞得很高远。工作之余，贺美湘学会了上电脑，在互联网上遨游。她注册了自己的QQ、博客、微博，经常与网友交流。由于不同寻常的人生，她对生命有更深刻的认识及对人生有更多的感悟，因此，她的话语犹如春风拂面，给许多遭遇生活难题和心理困境的网友以启迪和勇气。网友们纷纷留言：“你的毅力和坚强感染了我，我想不管我们经历多大的坎坷和曲折，都要坚强地活着，活出个精彩人生。”

“在我的生命中，无数人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我只想在我头脑还算清醒时，对他们说声谢谢，以一己之力，帮助一些人走出生命困境。”贺美湘说。

【文 摘】

第三章 词汇研究（二）：词语的显现与潜隐

刁晏斌

词汇的显现与潜隐是词汇发展变化的最主要方式之一，能够最直接、最明显地反映语言

与社会的互动和共变关系，而在文革期间，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有必要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第一节 词语的显现

文革期间新词语的显现，是很多人在讨论不同时期的新词语以及文革语言的时候经常会谈到的问题，比如陈建民（1999：61）指出：“20 世纪以来，汉语新词语的出现曾经有过三次“大爆炸”：一是五四时期的学者造词，大批外来词通过音译意译等方式进入了现代汉语。二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造词，大批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词语接连出现。三是改革开放时期带有全民性质的造词运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汉语新词语。”

陈建民（1999：13）把“文革词语”大体上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特有的事物和社会现象。如“红海洋、革委会、语录歌、忠字舞、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牛棚；

二是指称某种新的“政治身份”。如“走资派、三反分子、黑帮、黑司令、黑五类、牛鬼蛇神、红司令、红五类、红卫兵、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工宣队”等；

三是当时常用的政治用语。如“红宝书、老三篇、黑会、黑电影、黑日记、横扫、触及灵魂、最高指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三忠于、四无限、斗批改、上管改、文攻武卫”等。

戴昭明（1996：171—174）也指出：在文革语言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一批又一批稀奇古怪的“文革词语”。在词汇学上，它们属于“新词”一类，但又与一般的新词有所不同。文革词语的主要特点是：

- （1）虚妄性，如“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
- （2）幼稚的浮夸，如“红”族词中的“红卫兵、红宝书、红海洋”等；
- （3）违背事理逻辑，如“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绝对权威”等；
- （4）军事用语普泛化，如“教育战线、五七战士、炮打司令部”等；
- （5）损害人格尊严的污辱性、谩骂性用语特别多，如“黑五类、狗崽子、小爬虫”等。

郭伏良（2001：22）根据《新词语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的分期分类索引，对文革期间的新生词语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文革 10 年间新词产生总数 812 条，年平均产生 74 条；从新词反映的内容看，政治类 573 条，占本期新词的 71%，经济类 46 条，占总数的 5%强，文教卫生类 80 条，占总数的 9%强，体育军事类 41 条，占总数的 5%，科

技类约 34 条，占总数的 4%强，其他类 38 条，占总数的 4%强。

以下，我们以周荐主编《“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所收的词语为对象，考察和分析此期新生词语的某些特点。

《“文化大革命”词语辞典》的主编在序言中说，“这部书虽然是一部词语辞典，但它从一个角度完整地记录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因而也可以当作一部史书来读。”“我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有义务记录历史，告诉未来。”正因为有这样“纪录历史”的动机和目的，所以本书收词范围比较宽。“凡例”中说：“本书收中国大陆 1966—1976 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也包括‘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前夕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特有的词、固定语、谚语、格言、联语、口号等，以及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条目凡 1429 个。”

我们对本书所收的 1429 个条目进行了剔除，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人物和事件（这类条目在全书中占较大的比例）前者如“安子文、傅崇碧”，后者如“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八·二五’反革命事件”；

二是作品或文件等的名称，如“《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部队文艺工作会议纪要》”；

三是文革以前和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出现的词语，前者如“八字宪法、大鸣大放”，后者如“帮派分子、帮风”等；

四是旧有词语（但文革中可能义有扩大或引申等）如“罢官、赤卫队”等；

五是联语，这一类也为数不少，如“打击一小撮，团结一大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

六是其他一些与一般理解的“词语”相距过远者，如“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对‘四人帮’的批评”、“对错划‘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等。

剔除了以上条目后，共得词语 553 条，而这就是我们考察和分析的对象。

一、音节分析

此期产生的新词语，音节长度明显长于此前和此后的各个时期，以下对此列表说明，为了便于比较，我们还列入了文革后新词语的音节情况统计，这一部分内容取自刁晏斌（2006： 84）

表二

音节数量		1	2	3	4	5	6	7	8	9 以 上
文革	数量	0	65	154	170	66	39	32	16	11

	期间	百分比	0	11.8	27.8	30.7	11.9	7.05	5.78	2.89	1.98
	文革	数量	15	677	442	438	87	32	10	4	2
	以后	百分比	0.88	39.6	25.9	25.7	5.1	1.9	0.59	0.23	0.11

由上表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三音节和四音节新词语在所有新词语中的比例，文革前后基本持平，其他各音节则差别很大：单音节出现了有无的对立，双音节文革后远高于文革中，而五音节及以上文革期间则远高于文革以后。文革新词语的平均长度为 4.27 个音节，而文革后则为 3.05 个音节，差别是相当大的。

文革期间新词语词形较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指称时较多地使用了复杂的形式，通常是中心成分带了多个修饰限定成分，如“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这样长的虽然不多，但是像“打砸抢分子、党内走资派、第三个里程碑、红色司令部、阶级投降主义”这样的形式还是相当多的。在表示陈述时，则较多地采用已有词语的复合形式，形成偏正、并列以及主谓、述宾等结构，这也是造成词形较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按既定方针办、打砸抢抓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加拼命、节约闹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等。

单音节形式很难构成一个新的、区别于以前的指称或陈述形式，所以在考察的文革新词语中数量为零；二音节形式也因为容量有限，用于表示文革期间大量出现的“新生事物”，经常会有无能为力之感，所以数量也不多。而在此前和此后，双音节一直是新词语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形式。

刁晏斌（2006：84—85）分析了文革后新词语中双音节依然是一种能产形式的三点原因，即：

- 第一，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双音节始终是汉语韵律结构中的标准音步，所以，大量的新词语依然会选择双音节的形式；
- 第二，本阶段的新生词语中，仿词占了相当的比例，主要都是仿照已有双音节词的；
- 第三，新词语的另一种常用造成方式是简缩，而简缩往往就是把一个较长、较复杂的形式变为双音节的形式。

文革双音节新词语中有一大部分是由简缩而成的，比例达到了双音词总数的 52.3%，

它们是以下一些：

打斗、恶攻、二变、革干、革军、划线、九大、林办、联动、两论、六论、毛选、毛著、批邓、批孔、批修、清队、三旧、三老、三司、三同、十大、双突、四大、四旧、苏修、特嫌、西纠、现反、支工、支农、支派、支左、知青；

文革期间的仿词很少，只有“大节（仿‘小节’）、党阀、学阀（仿‘军阀’）、老保、老九（仿‘老乡’之类）”等几个，这并不是因为可以仿造的对象少，而是另有语言使用和表达以及社会方面的原因。仿词就语体色彩而言，大都有诙谐幽默以至于调侃的意味，通常以见于口语中为多，在比较庄重严肃的文体中很少用到（刁晏斌1995：24）而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的大搏斗”，自然是非常“严肃”的，与仿词所具有的语体色彩是极不协调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仿词不可能成为一种重要和能产的造词方式。

至于第一点，如前所说，文革时期的许多事物和动作行为等无法容纳于双音节形式中，因而只能取更多音节的形式，这样双音化的趋势也就无从体现了，这恐怕是当时新词语的创造者们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二、构词分析

从词语构成的角度看，文革新词语有以下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1. 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

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主要有“革命/革、红色/红、黑、一论”等，由它们构成的新词语分别有以下一些：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革筹小组、革干、革军、革命闯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同路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革命加拼命、革命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小将、革命行动、革命样板戏、就地闹革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世界革命中心论、踢开党委闹革命、停产闹革命、停课闹革命、文革接待站、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文化革命小组、业余闹革命、一月革命、以生产压革命、越穷越革命、中央文革碰头会、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红宝书、红代会、红革会、红海洋、红色电波、红色风暴、红色恐怖、红色日记、红色司令部、红色外交战士、红色造反团、红书、红司令、红透专深、红卫兵、红卫兵接待站、红卫兵小将、红卫兵运动、红五类、红袖章、红线、红小兵、红医、大红伞、锻炼红、改造红、根红苗正、根红苗壮、全国山河一片红、心红根正、自来红

黑八论、黑班底、黑班子、黑材料、黑干将、黑根子、黑后台、黑画展、黑画事件、黑会、黑纪律、黑六论、黑八论、黑牌、黑七类、黑手、黑司令、黑文、黑五类、黑线、黑线人物、

黑线专政、黑《修养》、黑样板、黑组织、三家村黑帮、三家村黑店、文艺黑八论、自来黑

“不见得”论、党内和平论、顶峰论、读书无用论、“反火药味”论、“反题材决定”论、根本任务论、阶级斗争熄灭论、空白论、劳动惩罚论、离经叛道论、全民文艺论、入党作官论、世界革命中心论、唯成分论、唯生产力论、文艺黑八论、文艺黑线专政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小节无害论、写真实论、血统论、中间人物论

此外，由“大”、“派”等构成的词语也比较多，分别有“超级大国、大辩论、大标语、大串连、大毒草、大方向、大红伞、大揭发、大节、大课堂、大联合、大民主、大批判、大批判开路、大批判专栏、大批判组、大树特树”和“保字派、冲派、打派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派、反军派、风派、观潮派、民主派、派性、派仗、三派人物、逍遥派、拥军派、造反派、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走资派”等。

以上列举的词语，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2. “数字构词”多

文革新词语中，由数字参与构成的相当多，主要有以下一些：


八条规定、百丑图、百万雄师、查三代、第二世界、第二武装、第三个里程碑、第三世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第一世界、二变、二月兵变、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新反扑、二月逆流总后台、二月提纲、革命的三结合、工业20条、公安六条、黑八论、黑六论、黑七类、黑五类、军干群三结合、九大、老九、老三届、老三篇、老五篇、两报一刊、两杆子、两个估计、两个一切、两论、两校大批判组、六厂二校、六厂二校经验、六二六路线、六二六指示、六六通令、六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七二一工人大学、七二一指示、三个世界、三个突破、三个正确对待、三和一少、三家村、三家村黑帮、三家村黑店、三家村集团、三结合、三旧、三老、三老四严、三类干部、三里五界、三名三高、三派人物、三十字方针、三司、三同、三突出、三脱离、三降一灭、三项基本原则、三项指示为纲、三要三不要、三支两军、三忠于、三忠于四无限、十大、四从四找、四大、四大武器、四个第一、四个面向、四个念念不忘、四个伟大、四个一切、四家村、四旧、五七大学、五七道路、五七干校、五七农民学校、571工程、五七战士、五七指示、五一六分子、五月妖风、一号命令、一号手令、一号通令、一看二帮、一批二看、一批二养、一批二用、一月风暴、一月革命、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这样的词语约占总数的20%，其中的数字有表示时间的，如“五七指示”；有用于计数的，如“六厂二校”；有用于排序的，如“第二世界”；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数字简缩的，如“三要三不要”等。

3. “军事构词”多

我们指的是军事词语用于构词。以前人们较多关注文革期间军事词语大量泛化的问题，其实泛化不仅表现在词汇使用的层面，也表现在构词的层面，但是后者似乎被人们忽略了。以下一些词语都是由军事词语参与构成的：

百万雄师、保皇兵、保皇军、长征队、打翻身仗、打横炮、打派仗、打语录仗、反击右倾翻案风、副统帅、革命闯将、革命小将、黑干将、黑司令、红色司令部、红色外交战士、红司令、红卫兵、红卫兵小将、红小兵、精神原子弹、揪刘火线、揪刘火线指挥部、刘邓司令部、派仗、三司、四大武器、文攻武卫指挥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五七战士、资产阶级司令部

以上词语占总数的近 6%。

【文 摘】

文化是什么（三）

——文化可以立国

龙应台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地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票收入的 28% 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的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知识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额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通过补贴，让 18 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槛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定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位，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東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韩国。受到1997年的经济冲击，韩国从1998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1997年制定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韩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政府只是泥土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向往文明的社会。在向往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针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呼吸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甚至彼此抵消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是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

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像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精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精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定，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如何，发展的趋势如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形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社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X光下的骨骼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他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制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准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


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瑞典斯德哥尔摩市的人口只有 100 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英国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 25 岁以下的创作者，美国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韩国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准，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准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专家的知识研判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还不算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咨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通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社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 21 世纪初此刻的香港。150 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未被“奴役过”的文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他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行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像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行销操作，也救不了的。

【书 讯】

书讯——《顾准和他的时代》



本书旨在向中国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介绍本国一位、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政治哲学家——顾准先生。它并不适合定位于“顾准传”或“顾准评传”。前者对时代的介绍必会受到抑制，这将导致主人公真实轮廓的模糊；后者则不是一般人敢于涉足的——无论是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人，评论顾准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大概“解读顾准”还算比较靠谱的定位。

当前最全面的顾准文字集萃非200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存》一套四册莫属，它们包括《顾准日记》、《顾准自述》、《顾准笔记》和《顾准文稿》。虽然还是被“按照规矩”大篇幅删去字句、段落、章节和整年的日记，但已算得上是最不错的版本并且早已断版。这套文选采用的是“2D”即时空表达结构，《顾准和他的时代》则试图采用3D——以年代为X坐标，以社会变幻为Y坐标，以传主的精神发展为Z坐标，尽量完整地覆盖此人一生这三个维度的表述结构。

在涉及最后一个维度时，不得不撰写一些非常困难的段落，尤其是第四部的中间两个章节。然而这些段落对于准确描述作为思想家-政治哲学家的顾准是必要的。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作者这样既非科班出身又非专业人士，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立场。希望能向读者呈现一个合理的、稳妥的、人的形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作者依赖引述，并始终在避免偶像化的趋势，但有时也确实很难压抑自己的情绪倾向。

本书作者王晓林，1953年生人，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深圳蛇口工业区最早的建设者，个人电脑和因特网最早的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捐赠者和至今的志愿者，2001年作为一名通讯工程师退休。偶尔投稿《炎黄春秋》、《温故》、《明报月刊》等杂志，除“孙冶方基金会志愿者”外，没有任何头衔和“挂靠”单位。之前有《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双子星 薛明剑、孙冶方兄弟评传》一书出版。此书是她用去6年时间的呕心之作。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中关村创业大街昊海楼一层

010-8841 5586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二、定制服务：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家族徽标 + 家族文化墙 + 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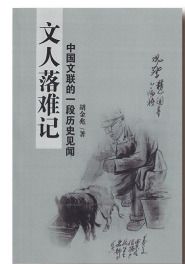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家谱传记文化馆 + 定制服务 + 兴趣班 + 寻根游 + 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

